

陸 灣 著

我所了解的孙逸仙

庄 武 霽

中国和平出版社

我所了解的孙逸仙

陆 灿 著
傅伍仪 译
季 风 校

中国和平出版社

责任编辑：伏 碗

我所了解的孙逸仙

陆 灿 著

傅伍仪译 季 风校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字数42,000 开本787×1092 印张2.25 插页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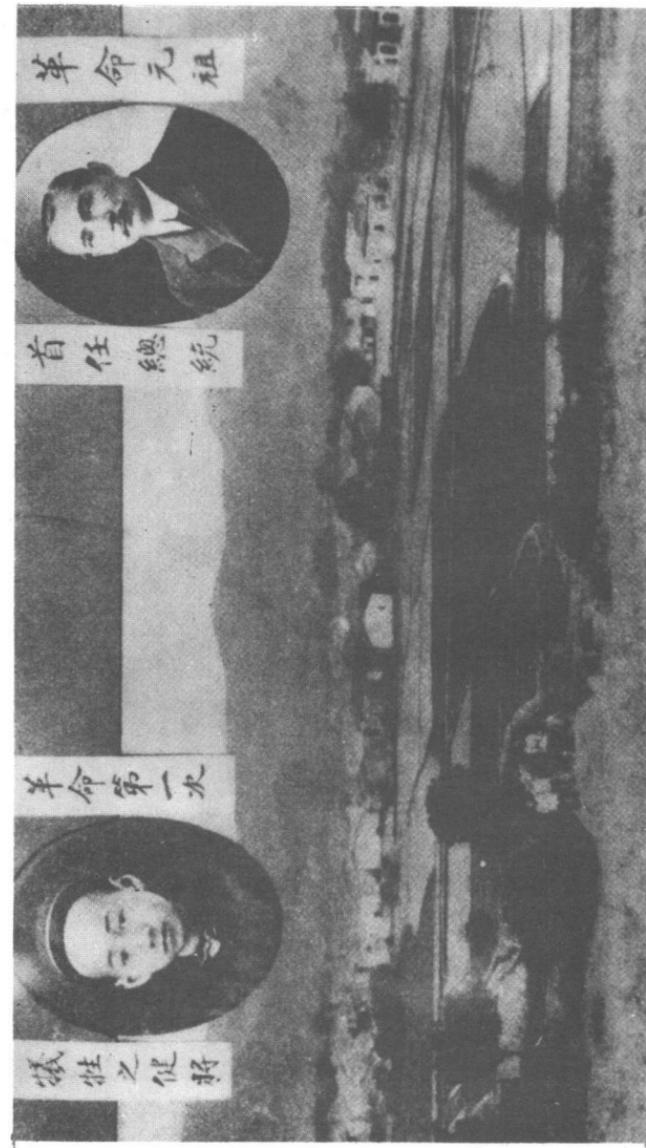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40册

统一书号 10481·022 定价：0.70元



孙中山十八岁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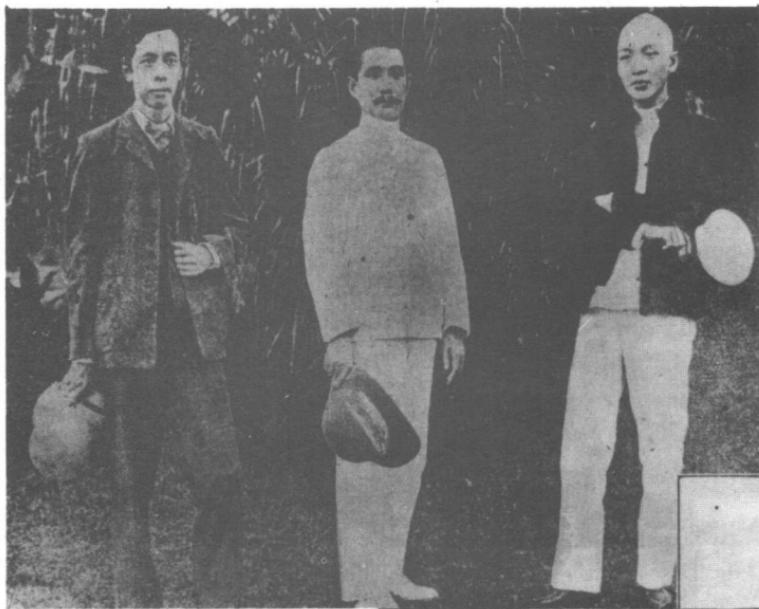
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这里出生。左上角小像为他青少年时代好友陆皓东烈士，本书作者的叔父。



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与友人合影，前排左起：
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是同学关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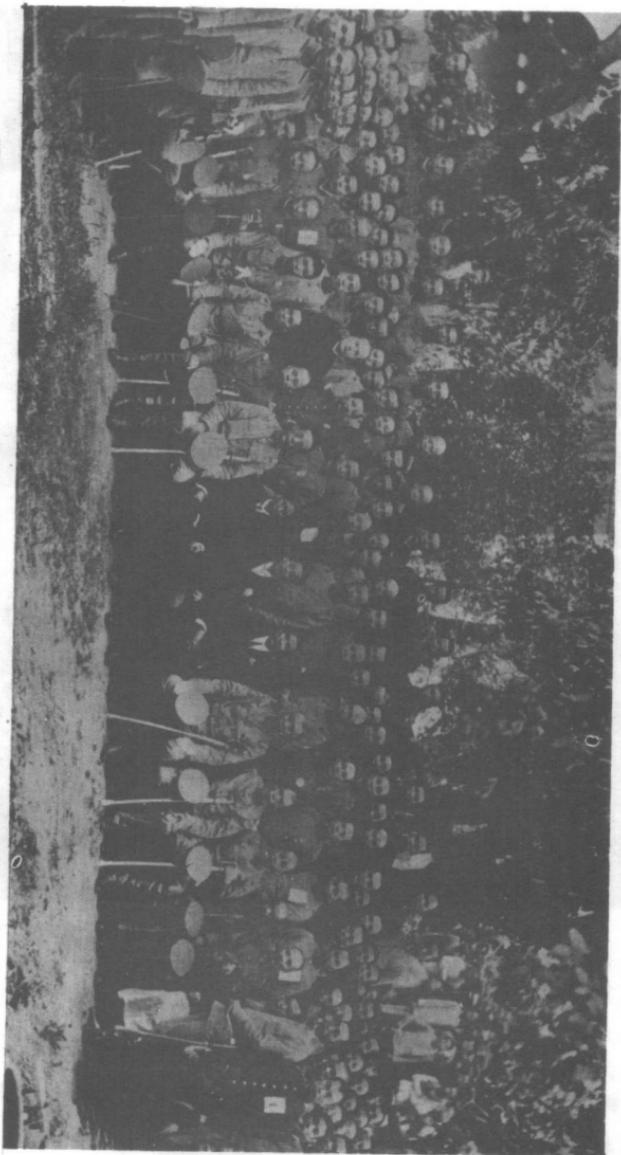
一九〇五年春，孙中山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与留学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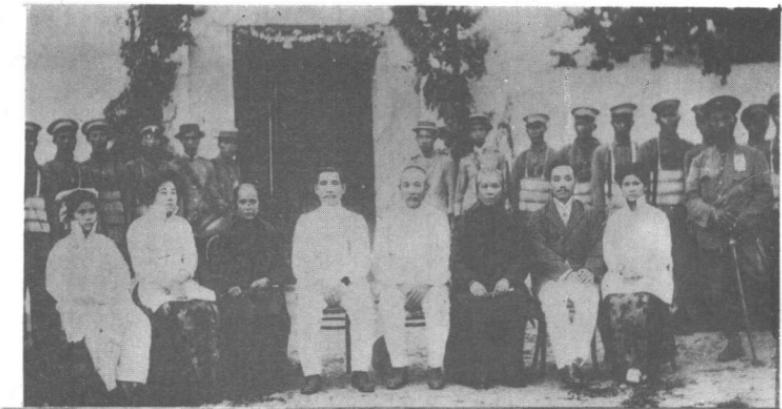
上：1906年孙中山赴南洋筹款在新加坡与友人合影。

下：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抵福州考察时，与各界欢迎者合影。



上：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在翠亨村故居门前与家人合影。

下：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日本开会庆祝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前排左四宋庆龄、左六何香凝，后排左二廖仲恺。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后留影。

一九二三年八月在永丰艦上留影。



1924年2月24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左旁第一人为孙中山。中立者为廖仲恺。

华侨是革命的母亲

孙逸仙

献给亲爱的叔父，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个烈士陆皓东，亲爱的父亲、为革命事业坐牢六年的陆连谷以及所有勇于献身的死难爱国者。

作 者

目 录

前 言	(1)
一 出生和童年时代	(3)
二 学医、结婚、第一次造反	(11)
三 在日本和夏威夷	(19)
四 加利福尼亚和英国	(22)
五 欧洲 海峡地区 重返	
中国	(28)
六 美国和欧洲的组织	(32)
七 家 庭	(39)
八 为一九一〇年作准备	(44)
九 革命成功 孙被推举为	
第一任总统	(48)
十 第一个政府的危机——	
背叛	(56)
十一 试图重整旗鼓——部分	
成功	(59)
十二 苏联的影响	(63)
十三 疾病、逝世、留给人民的	
遗嘱	(64)

前　　言

中日战争期间，檀香山的社团一致选举我任不取酬的援华会主席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常收到大陆（指美国大陆——译注）作者来信，要求我写我所了解的孙逸仙的传记。但那时我忙于筹募捐款，无力进行为这位伟人写传的巨大工作。

战胜日本后，援华会解散，我才有时间收集资料和照片来编写这本书。访问大陆时，我在洛杉矶拜会了贝蒂·泰勒夫人，她曾通过旧金山和檀香山的中国领事馆写信给我，询问我有没有关于霍默·李将军（美国人，曾任孙中山的参谋长——译注）的资料。我拜会她的时候给了她一本我记得的从南京开始的短故事。她志愿帮助我写孙逸仙传记。

鉴于当前中国饱受内战、干旱、洪水、通货膨胀之苦的灾难处境，我自愿把写这本书得到的钱送到中国去援助受难的人。

我一向认为，孙逸仙的真实传记应由中国人来写，以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写孙博士的书已有很多，但通常是从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来写的。中国人知道这些著作中不少叙述和描写是不正确的，但没有人去做更正工作。

伟人的真实情况往往被传奇化和神秘化，孙逸仙也不例外。他在西方世界被描绘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和神秘的叛

逆者的混合体。正是为了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写了这本书。我可能并不比很多其他的人更适合来写孙博士的生平，但至少我在此书中采用的事实是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和记忆而不是道听途说。为了中国，也为了全世界，我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任总统的更清楚的更真实的写照，可以使东西方之间有更完好的了解。

陆 灿

一、出生和童年时代

孙逸仙和我出生在同一个村子里，一个中国南方广东的小村子，名叫翠亨村。翠亨是透明的碧玉的意思。这个村子座落在石歧和澳门之间，水路可通金星港，离广州和珠江四十英里。五英里外才有一个集市，平时买东西要靠行商小贩。十英里外有个两千户人家的董家村。我们和董家村的人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我的祖母是董家的，她的哥哥、我的外伯祖父是董家的族长。

我们的村子有一百来所砖瓦房，四周有中国式的矮围墙。围墙外面是稀稀拉拉的农民的泥草房。

清朝官员和税吏常常对我们采取粗暴和高压手段，甚至纵火烧房作为消遣，更多的时候是逼我们缴粮纳税。无疑地，这是促使孙逸仙反对压迫的开始。

翠亨村是香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后来为纪念孙博士，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村外群山环绕，泉水灌溉着肥沃的稻田。大部分稻田为本村或住在大城市的地主所有，但都由佃农耕种。

有一个种着村边十亩地的佃农叫孙达成，就是孙逸仙的父亲。他靠这点地养活妻子、两个嫂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过着俭朴的生活。一个儿子很小就死了，只剩下一个儿子叫阿眉，大约十五岁，还有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辛勤劳动的家庭，但也是一个有智慧和厚道的家庭。这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满洲贵族统治下，因循守旧，非常落后。

我比孙逸仙小七岁，当然不可能记得他的生日，但我相信我能正确无误地告诉你，那是一八六六年的十一月。那时美国正在致力于消除内战的后果，欧洲盲目地走向四年后爆发的普法战争，而中国被旧传统束缚着，像一头在满族贵族征服者铁蹄践踏下的睡狮。

在翠亨村，山岭贫瘠，天气凉爽但并不寒冷，北风把落叶吹到一座寺庙周围。在庙里，三个村神静坐着，两个女神和一个坐在它们中间的男神。男神北帝是这个村子的主宰。他手持宝剑，母指朝天。村民们在这里烧香，祈求好运。

孙达成家虔信北帝。一天傍晚，这个农民和他的妻子、两个嫂子谈论着北帝，两个孩子在屋外静听。孙达成的妻子，一个黑皮肤的小脚女人，正怀着孕，她做了一个梦。

她对丈夫说：在梦里，北帝垂头丧气地向我走来，他披头散发地哭着，好象我怀的孩子是他的克星似的。我们必须设法消灾避难，把孩子奉献给神，求神保祐。我们应该给孩子起名“帝象”。

在这点上她和丈夫有些争论，但她坚持，因此，十月十二日，当儿子出生时，他被命名为帝象。她希望把孩子奉献给神，他就不会危害神灵了。然而，命运表明，帝象不仅反对村里的神，而且反对国家的、朝廷的神。

帝象就是孙逸仙，他生长在广东偏僻地区的村子里，过着农家孩子的普通生活。他个子不高，相貌堂堂，有着母亲遗传给他的圆脸和黑皮肤。他温和好学、真诚，但在儿童时代就反对陈规陋习。我们多数孩子在家不做什么事，但帝象要帮他父亲做些家庭杂务。

村子里有两所中国老式学塾。学生一天到晚读书，只在

吃饭时才休息一会儿。一个中年男教师管教我们很严格，每天他要全班学生朗读，然后一个个背对着他背诵。有钱的学生自带桌椅，其余的坐在学校的破椅子上。中国学究式的迂缓、单调的教学方法，引起很多非议，但这种方法尽管教得少，却教得扎实。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学习的《三字经》是不容易忘记的。多年以后，孙博士告诉我，他还记得在村塾里学到的功课。

除了春节一个月假期，只有端午和中秋是放假的日子，我们兴致勃勃地玩两种游戏。

第一种叫跳青蛙，类似美国的造房子游戏，机敏的帝象总是领先。

第二种叫砍甘蔗。把一根长甘蔗直立在地上，每个孩子拿刀从顶端砍一下，砍下的甘蔗皮越长越好，砍得最长的人吃甘蔗，其余的人付甘蔗钱。帝象常常是吃甘蔗的，而我则很少吃到。其他的游戏有放风筝，踢毽子和耍棍棒。

在此期间，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逝世了。按照中国习俗，他的儿子把他的遗体送回家乡翠亨村来安葬。死者的儿子陆皓东是我的叔父。他只比我大几岁，大约十二岁。他留在村里读书，成为帝象的好朋友。

陆皓东这个人才能出众。他出生在大城市上海，阅历比我们丰富得多。他是个优秀的学者、聪明的艺术家，还具有音乐家的气质，他的观点是很进步的。他和帝象一样，不满村民对满人那样畏惧和麻木不仁。他是个敏捷、活跃、心明眼亮的孩子，有着无穷的好奇心，一旦献身事业，就迸发出狂热的忠诚。后来，他成为第一个革命烈士，就是明证。帝象和陆皓东志趣相投，成为终生密友。

这时村里街谈巷议的中心是夏威夷，许多人家的子弟去那儿成了商人或地主，翠亨村不断收到来自夏威夷的家信，说那儿很容易谋生，而且生活比这里好得多。在夏威夷发财的人们中间就有帝象的哥哥孙眉。孙眉来信请父亲允许帝象去檀香山上学，帝象很高兴。自从陆皓东来翠亨村谈到外部世界的情况，帝象一直向往外出旅行。孙达成为儿子准备好行装。父母、伯母和同窗好友舍不得帝象远行，陆皓东和帝象更是难舍难分。但对帝象来说，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冒险机会！我想他一直是喜欢旅行的，即使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涯中，也是如此。

一个黝黑的，个子不高的十三岁男孩，文静但又好奇，从澳门乘英国轮船格拉默克号启程。他从此踏上毕生的旅程，决不后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船上，他用大部分时间向能听懂他的话的人提问题，他还到轮机室去看巨大的轮机是如何运转的。

经过三个星期愉快的旅程，他在檀香山下船，穿着中国长衫，辫子盘在头顶上，戴着红顶的绸瓜皮帽。哥哥孙眉到码头来接他。在一个中国农村孩子眼里，这儿到处都是新奇景象。高楼大厦、棕榈树和拍岸的浪花、白皮肤蓝眼睛的人，说话是那么怪声怪气，还有那些色彩丰富的海岛居民。

帝象忙于观看眼前的景色，几乎没有听到孙眉在说什么。孙眉说他将送帝象到一个名叫洛拉尼的教会学校去上学，校长是艾尔弗雷德·威利斯主教。遗憾的是孙眉住在一个遥远的、名叫莫衣的海岛上，他在这个岛上经营一个牧牛场。因此，帝象必须住校，而且不能常去他哥哥那儿。这实际上正合帝象的心意，他可以自行其事，不受家庭的约束。

艾尔弗雷德·威利斯主教是个无私的，不寻常的人，后来我去檀香山，他成了我的老师。他很关怀身边的中国年轻人，并且竭尽全力教育他们。为了让他们负担得起，每年包括食宿的全部费用只收一百五十美元。

艾尔弗雷德·威利斯主教对帝象非常关心，帝象不会讲英语，但学习很勤奋。当然，在洛拉尼学校所受的教育和我们村塾中那些死背硬记的四书五经是完全不同的。对帝象来说，一切又是新鲜的、富有吸引力的。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大事。这使他对中国的生活更加不满。

他进步极快，三年后，一八八二年他获得英语语法的二等奖。奖品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由海岛的国王卡拉卡瓦亲自当众授给他。

这时他已能讲流利的英语，他对许多事情都感兴趣。有一次 he 去看他哥哥孙眉时说，他想和同学一起受洗做一个基督徒。

孙眉感到吃惊，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送弟弟去学校只是为了受教育。他对帝象竟敢离经叛道，皈依洋教十分震怒，禁止他这样做，并给父亲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父亲回信命令帝象立刻回家。

帝象乘船经香港回国。在去翠亨村的路上，换乘一条当地的帆船。途经一个小岛时，船长告诉乘客说海关官吏要来检查，如有人违抗检查，将给全船人带来麻烦。

海关官吏受贿收礼而且很贪婪。第一次检查后，帝象刚收拾好行李，很快第二批关吏出现了，人们再次打开行李。第三次是查缉鸦片的，关吏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帝象还没有把第三次检查后的行李整好，第四批关吏又来了。他们穿着

制服，全副武装，声称是来查煤油的。帝象认为太过份了。他粗声对他们说，他的行李已被检查过三次，只要看看他行李的大小和形状，就可以清楚行李中决不会藏有煤油的。

关吏们很快转身走了，这使船长和旅客们惊慌不安，他们抱怨此举将给大家带来麻烦，这条船将被扣留，明天走不成了。

帝象平静地说，船抵港后，他要代船长向高级官员告状，船长和旅客嘲笑说，这里不兴告状，如果越级上诉，只会找来更多麻烦。

这时船长讲了一个故事：一名旅客从香港回乡探亲，随身携带一些香肠，两次都被贪得无厌的关吏没收，第三次他在香肠里放了毒药，这个关吏被毒死了。

帝象趁机宣传起改革的必要，他告诉人们：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予人们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检查是不应有的。必须反对，令人费解的是关吏没有再来找麻烦船被放行了。（据悉是敲诈了船主一笔不小的“罚款”后放行的。——编者注）

十七岁的帝象回到家乡，和四年前离开时完全不同了，西方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满脑子新思想，对人们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不满。过去在他身上表露的独立性格和果断，现在已变为公开的造反和对抗。

村里每一件落后的事都使他不高兴。他痛苦地认识到，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这个村子的人民多么缺少自由和发展的机会。传统观念和愚民教育，加上清政府的残酷统治，使他的同胞们镣铐在身，不能自拔。他并不是第一个或唯一意识到这些积弊的年轻人。中国有数不清的秘密社团，多方试图进行改革或推翻现政府，而且不断爆发起义，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持续了十四年。但由于清政府的镇压和外国的干预，所有的反抗都失败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抗和推翻清政府几乎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但一系列政治上的惨败逐渐证明清政府已无能力治理和保护中国。鸦片战争导致向“蛮夷”屈服，太平天国起义几乎致清政府于死地，一八六〇年俄国要求割让北部疆土。这些事件使清政府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丢了脸。皇室统治的腐败，慈禧太后的更加专权，使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憎恨达到极点。

因此帝象和许多有头脑的中国年轻人完全认清了清朝制度的罪恶，要改变它。我认为，这时他还没想到自己去改变它，他希望协助、鼓动其他人起来干。

他常常和我的叔叔陆皓东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对此感兴趣。陆皓东自告奋勇，在广东衙门征兵时，报名参加清政府军队，接受军训，他受训回来后以厌恶的口吻对帝象说：由五十个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就可以打垮这个军队和摧毁保卫广州的虎门港。

帝象沉思地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队伍呢？如果有这样的队伍，我们就可以夺取政权，中国就可以取得她在世界强国中应有的地位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开始做这件事呢？”

陆皓东笑道：“也许你就是做这件事的人。”

对陆皓东来说，这只是一个笑话；但对年轻的、有理想的帝象来说，却孕育了要为中国建功立业的思想萌芽。

反抗，任何方式的反抗成了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在谈论失败了的太平天国起义，一八四六年由洪秀全发动，最初是一种基督教运动，后来成为有组织的反清斗争时，这两个孩子认为，反抗是从砸烂古老的偶像开始的。

帝象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启示，他决心和束缚他的神、家庭和传统习俗一刀两断。他把陆皓东和我以及另外一些孩子叫到一边说，他从夏威夷回来后，曾被迫去庙里烧香；但他只是做样子，他不信神。我们不仅吃惊，更被他接下去提出的建议所激动。他说他要带我们到庙里去扫除迷信，捣毁他一生下地就把生命奉献给它的这个北帝。这对一个中国南方广东农村的青年来说真是一件惊人之举，他别无倚靠，有的是伟大的理想和坚强的决心，他是在为人民、为中国而斗争。

我们在大白天去庙里，那儿没人，只有一个看守人在外面睡觉。留下两个人，盯着这个看守，帝象和陆皓东走进庙里，帝象砸断了北帝那只朝天的手指，陆皓东用小刀刮掉了一个女神脸上的油彩。

我的同伴和我好奇心胜，只顾看他们在里面怎么干，没有注意到看守醒了。他立刻发出警报，我们都逃回家里。帝象被人看见了，并被认出是带头的。从我前面介绍的背景情况你们可以想象翠亨村是如何惊恐万状。他们认为这种卑劣的恶行是前所未有的。

大人们赶到孙达成家告诉他，他的无法无天的儿子在庙里干了什么勾当。孙达成和他的全家为此感到万分羞愧。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他感到窘迫、惭愧、恼怒，而且不知所措。村里长辈则要求必须整罚帝象，否则神将不会息怒，甚至降灾全村。孙达成一家人的辩解敌不过全村人的压力。这次恶作剧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意外：帝象被迫忍辱离开了翠亨村。我们谁都没想到捣毁神像的后果，但帝象自己在策划和采取这一行动时却非常清楚其危险性。我后来了解到，他每做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好目的、影响和最后结

果。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非常冷静和镇定地在羞辱中离开村子，开始他自己的独立生活。他从不为任何事件所困扰，无论事情是多么严重。他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地去了广州。后来他就任中国第一任大总统时也是这样镇定自如。

二、学医、结婚、第一次造反

我不再叫他帝象，因为这个乳名只在他家居乡村的青少年时期使用。既然他在新的理想、和信念鼓舞下离开了翠亨村，我将报道他此后的独立行动，并叫他孙逸仙。

他到了广州，没有钱，没有朋友，更没有职业；但他意识到他拥有一种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他在洛拉尼学会的流利的英语。他去找广州英美医院的一个工头，凭着他的英语能力，被雇用担任见习办事员和翻译。虽然他的工作繁重而琐碎，但他再一次认识到与现代技术相比，中国医生的迷信和不完善的医术是多么落后。

一个名叫克尔的医生成为这个严肃、勤奋的中国青年的朋友并很器重他。有一天克尔告诉孙说，香港的教会将开办一家招收中国人的医科学校。毕业于苏格兰的律师和外科医生何启博士带了一位苏格兰夫人回到中国，她死后留下一笔财产，由香港教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医院。这个医科学校命名为爱丽斯医院，以纪念何启博士的妻子。年轻的孙逸仙立即为通过先进医学来帮助人民这个想法所鼓舞。他对克尔博士说：“我要进那个学校”。克尔博士为得到这个劲头十足的学生而高兴。

回头来看看我们的家乡，这里发生的一些事也影响着年轻的孙逸仙的生活。他的父亲一年前去世，按习俗，他的母亲觉得儿子已快二十岁，就写信给他说他该结婚了。她为他挑选了邻村的一位姓卢的姑娘。即使是那么有造反精神的孙逸仙也不能违抗母命，他回到翠亨村来结婚，尽做儿子的本分。他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从未见过她，按习俗要到举行结婚仪式后才能见到。婚礼是有趣的中国老式的。婚后，他立即回到香港，准备进医科学校。在等待开学期间，他决定请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为他举行洗礼。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似乎是新旧混杂的。

一八八七年六月，詹姆斯·康德黎医生从英国来开办这个中国医学院。秋天开学，从一开始，孙逸仙就显示他是个有能力的、真诚的、勤奋的学生。他引起了康德黎医生的注意。康对他十分关怀，认为他不仅是学生和未来的医生，还是个人才。在孙逸仙的众多朋友中，他和康德黎的友谊是最忠诚和持久的。

在同学中孙也有一些密友。他对中国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把他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向他们宣讲，他热切希望中国有一个新政府，中国需要正规的教育和先进的农业。在孙的指引下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有权向统治者提出要求。这种思想是非常激进的。但孙解释说，它的基本原则是很简单的，必须让人民吃饭、受教育。先进的农业可以使人民有饭吃，先进的教育方法和平等权利可以使人民都受教育。没有理由说人民不能管理自己。对年轻学生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思想，因为年轻学生是容易接受叛逆思想的。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即使孙逸仙本人这时也没有什么活动计划。他和同学们

一样，热情奔放，认为必须干一番事业，但应当怎么办，他也不清楚。因此，他继续潜心学医，仍想以医术来为他的同胞提供最好的服务。

遍布中国的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风行一时，但多数团体说得多做得少。孙的一个姓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我的叔父陆皓东也是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孙逸仙对他的好朋友的活动也发生兴趣。各种历史事件激励这个团体加紧努力宣传革命道理，日本吞并台湾，使年轻人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现代化”对国家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表现新的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陆皓东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后来，它演变成为中国的国旗。

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孙于一八九二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医学院。同年，他和陆皓东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决心持之以恒地摒弃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他不再用帝象这个名字而叫孙逸仙了。孙是他的姓，如同英国的史密斯或琼斯。而逸仙这两个字译成英语有自由神的意思，或者广义地说，有敢于自行其是的意思。

那时候，行医是不容易的，孙选择的第一个开业的地方是澳门，那里的医生妒忌这个掌握现代医术的中国年轻医生，认为是对他们自己职业的威胁，此外，孙必须使中国人信服舍弃旧医术采用现代医术的医生。开始上门求医的人很少，但经过几次治病和做手术，孙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在澳门，孙和各种秘密社团的成员讨论政治和议论政府。他惊奇地发现许多青年对中国有着和他同样的想法和希望。很多人和他一样，在教会学校上过学，通过旅行和接受西方教育开阔了眼界。他们回到中国，自然会看到她的缺点和落后，要

求变革。现在的青年学生，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后回到家乡，不是也要把大城市和他的家乡作比较从而发现家乡的落后吗？向政府呼吁是徒劳无益的，甚至遭致坐牢或杀头之罪。也不能指望得到老年人的支持，因为老年人不是传统观念太深，不思改变，就是打心眼里害怕清政府。尽管清政府已经在中日战争中，在俄国和英国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中丢了脸，但慈禧太后在中国仍大权在握。孙逸仙博士认为设法使慈禧太后为她的臣民做些好事比行医更有用处。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做医生，我一次只能治好一个病人，如果我帮助中国获得解放，我能同时治好四万万人！”因此，他准备孤注一掷了。为了帮助他的人民，他义无反顾地离开澳门，抛弃医生工作，就象他过去离开他的故乡那样。

他和他的朋友陆皓东一起回到广州。孙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们安排他去演讲。通过他的声音取得不少成绩。虽然他讲话时很平静。但他口音清楚，对听众很有说服力。然而，开头是不容易的。他不惜化费时间练习，象做其他事一样，他很快就精通演讲艺术了。孙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还是个天生的领袖，他的朋友们很快承认他为领袖。他们希望他通过演说，宣传他们的理想并把理想变为现实。

孙博士回到广州，把他的总部设在一个药店里，用这个药店作为革命活动的前哨阵地。一八九三年他和陆皓东经汉口去北京，亲身考察清政府的制度。他发现这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年轻的革命者们决定通过李鸿章上书政府，要求改进教育和农业，但很快遭到拒绝。

上书被拒，使孙和他的追随者认识到，用和平的方法永远也不会达到目的。只有暴力、革命才是出路！他们秘密开

会，筹款购买武器。一切都在秘密进行。

第二年是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忙于和日本打仗，孙看到这是个机会。经费是件大事，他决定去夏威夷请孙眉帮助。他哥哥终于信服了新事业的意义，和另一个夏威夷华人邓荫南成为第一批支持革命事业的富商。他们尽可能为孙提供资助，并帮助他动员当地人加入新成立的兴中会。当孙于一八九五年离开檀香山时，已有近百名会员。

邓荫南和孙一起回国，帮助他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他们打算以广州做起义的据点。

兴中会在香港开设了一个进口贸易公司，而在广州利用一个农业学校作为掩护起义活动的前哨据点。

九月九日，因武器装船时的疏忽，广州的海关官员发现了六百支手枪。政府密探通知皇家军队包围了广州总部，在那里抓走了陆皓东，苏西，朱贵全。孙博士在去总部途中及时得到通知，才免遭逮捕。

那时，我从夏威夷回乡结婚，虽然我了解情况，但谣言使村里人感到震惊。陆皓东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不惜卖掉年轻妻子的首饰来资助革命运动。

我的姑妈住在广州，她来信谈到陆皓东的事扰得村人惶惶不安，没人能够理解这个鲁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去闹革命。

这个勇敢的小团体一开始就遭到不幸，而且很快在翠亨村引起令人惊恐的反响！我的姑妈立刻写信来说陆皓东被捕，孙逸仙被迫逃亡。我后来听孙博士说，他从广州逃到内地一个他在洛拉尼学校时的同学董风家，半夜把他的同学叫起来，请董搞一顶轿子，送他去澳门乘船赴香港。在这个英国租借地，他曾想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打听他们能否帮助陆皓东。

陆皓东坚决拒绝向清政府提供任何情况。

我们在翠亨村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这时我刚举行过婚礼，族长（我的一位叔祖父）收到我姑妈的信以后，这个老头完全陷入了窘境。

他恼怒地从坐椅上跳起来又坐下去，引用信里的话，说这些年轻人发疯了，他们将使全村人丢掉脑袋！他唉声叹气地说，逮捕孙逸仙及其同党的命令已发出，因为他是族长，警方可能要他负责！他完全被吓倒了，不知所措。我想我是太年轻了，看他穿着长衫象木偶似地蹦跳，只感到很有趣，一面在思忖着这次打击何时将会到来。

终于他问我“你害怕吗！”我回答说我不害怕，我还说我断定我另外一个叔祖父，董家村（比我们的村大得多）的村长也不会害怕。我建议他去找这个亲戚，看看他是否也在伤脑筋，并征求他的意见。我的话似乎使我叔祖父高兴起来，不再害怕了，但他要我代替他去，因为他年老体弱。他急急忙忙地设法给我弄了一顶轿子，让我上路。我告诉他上午去时间较充裕。

第二天一早我坐轿子到了董家村。叔祖父是个做官的，我必须向他行官礼，所以我穿了长袍。在夏威夷过惯了自由的生活，对这些礼节我似乎感到很陌生了，因为我一直在外面上学，刚刚回来结婚。

叔祖父的房子在一座山上，很壮观。他的两个兄弟的房子也在这座山上，他们三人统治着董家村。这个村子有两千幢房屋，是这个地区的集镇。

登上二十一级台阶，到了叔祖父家，他家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叔祖父在门口迎接我，我向他行作揖和三鞠躬礼。

他身穿全套官服，时而摆弄他那稀疏的长须以示尊严。我们终于在客厅里落坐，按习俗开始谈谈天气、花园、季节，直到叔祖父尖刻地说：“你一大早来有什么事？”我才感到应该开始说明我的来意了。

我有礼貌地答道：“来向您请安，叔祖父，我们不常来看您，我祖母念叨您是否安好。”

叔祖父抹抹他的胡子说：“你不会一大早老远来就为了这个，来，告诉我你究竟为何而来。”

他这样吩咐，我就可以谈实质问题了。我把村里发生的不幸事件统统告诉他，还说我那族长叔祖父不知该怎么办。

开始，他对这帮学生的古怪行为感到好笑，认为他们自命不凡，但没有什么害处。当我谈到姑妈来信说她的侄儿陆皓东被捕，可能很快要被杀头时，他拽动两撇胡须，从椅子上跳起来说：“你们这些无权无势一介草民怎么能搞推翻政府这样的大事？这是造反，叛逆！”他接着又训斥了一遍，我只是静静地听着，等他消了气并坐下来。

“您有丰富的经验”，我说“您一定要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怎样对待清兵来搜查孙逸仙和陆皓东的家。”我们都记得，这两个莽撞小伙子的家一定被查封，虽然他们的家人已离开家。孙博士派人把家人接到香港去避难了。

叔祖父猛拽他的胡须，拽了一边的又拽另一边的，一面沉思着。他问我们族长有没有关于治安条例的书。我说我不知道。叔祖父拿出他的书说应当让族长看看有关查封的几段。他还说村里的当事人要好好招待士兵，陪着他们去搜查（尽可能带他们）绕弯路。然后说，根据书上规定，可以按军队行走的路程给予“报酬”。你只能提出这点建议，如果

士兵得到了报酬，认为没什么可“充公”，他们可能立即离去。

我带着这点堪以告慰的指点回来，叔祖父贪婪地阅读治安条例。他打算完全按照建议办事。但是，我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在村周围的山上布置了带枪的人，以防全村人被逮捕或被屠杀。事实上并没有发生麻烦，士兵们无意追究此事，他们收了“报酬”，让我们领他们到孙逸仙空无一人的家，最后平静无事地离去。

与此同时，孙博士在香港为援救陆皓东进行不懈的努力。他要求美国领事出面调停，他还找了陆皓东任职的电报公司出面作证，说他只是这个公司雇用的一个学生，不会认真从事革命活动的。但朋友们对这个年轻革命者的热情都缺乏足够的估计。当美国领事去中国衙门斡旋时，发现陆皓东已经写了招供！他向朋友们说明，他希望成为革命事业的第一个献身者，并声称清政府可以杀掉他一个，但杀不尽千百万革命的后继者。在第一次造反失败后的十五天，他被斩首了。

孙博士捎话来叫我去香港会见他。陆皓东的死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但他决心继续革命，他告诉我他将去日本神户避难，并在那里工作，准备第二次造反，他问我能否把他的妻子、母亲和三个孩子带到夏威夷去给孙眉抚养。他说他们在中国是不安全的。我立即答应并很快送他的家属去夏威夷。

当我离开香港时，我感到孙逸仙变得果断、冷静，象将军那样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一个轻举妄动的男孩帝象变成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精明的、坚定不移的领袖。在这种大无畏精神面前，一千次失败算不了什么。虽然我周围这么多人的微薄努力归于失败，但与孙逸仙谈话后，我第一次对中国有了坚定的信心并决心尽一切力量帮助她。

三、在日本和夏威夷

我们乘船到达夏威夷，孙博士的家人安顿在莫衣岛他哥哥孙眉那儿。我们直接和间接地听到孙逸仙在日本活动的消息。

孙博士的朋友资助他到达横滨。他说他要把横滨作为他的流亡基地，因为那里离中国近，是个领导今后行动的好地点。

一八九五年，中日签订和约使孙能去到横滨。虽然和平了，孙仍得时时防备落入敌手，满清政府悬赏十万元买他的头，并向日本派出大批密探。而且，各国之间实施引渡法，如果他被捕，就得被送回中国受审和处决。

在他早年从事的公共事业中，他已习惯于经常冒生命危险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他不是威胁，而是激励。

那时，化装很重要，他剪掉辫子，穿西服，留胡须。因为他皮肤黑，很容易被认为是日本人而免于遭难。后来，人们说，他穿着整洁的黑衣服，留着修整的胡须，不象中国人而象一个干净利落的法国人。

孙博士在神户住了一年，在他的中国朋友和日本同情者的帮助下建立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总部。他发现日本人对他的计划非常感兴趣，并且关注和帮助他。这些情况后来产生了反响，他们的帮助使他有可能为日后的革命活动奠定基础。在与世隔绝的神户，孙博士和他的小小队伍不倦地进行工作。

夏威夷是同情和支持孙博士的沃土。首先，我们都是广

东人，并同他紧密合作，支持过第一次广州起义。在檀香山，人们热心革命并期望孙博士能获得成功。因为，我们多数人在夏威夷受过西方教育，要求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们深切感到陈腐的中国政体应该改变，我们很愿意为改变中国出力。孙博士认识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进步青年的支持的重要性。他必须争取道义上和经济上的帮助，没有其它地方比夏威夷更能得到这方面的帮助。

我们听说他准备于一八九六年初来檀香山。中国领事打算安排盛大欢迎仪式。后来，知道孙博士是满清政府通缉的革命领袖，他立即改变计划，不敢露面。

但我们很多人都去迎接他，对这位敢于公然反抗“龙庭”的年轻革命者大家都非常尊敬。我们在洛拉尼受过他的教益的人迫切地认为中国需要改变。但更使孙感到惊奇和感动的是夏威夷的老年华侨也给予他真心的关怀和忠诚的支持。在旧制度下，人们真会感到奇怪，怎么那些老年人会去盲目地追随这个年轻、激进的领袖，尤其是，孙博士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亡命徒。这些老年人对孙的支持是一致的而且是持久的。确实，这个旨在唤醒人们思想的新团体已站住脚根并且工作得卓有成效。

在看望他的家人和亲密朋友后，孙为革命事业开始了扎实的组织工作。虽然得到同胞们坚决的支持，工作进展仍然缓慢，孙以最大的热情和不倦的努力始终把改革中国的纲领和计划放在首位。象一个新传教士第一次向信徒们宣讲神课那样，他缓慢地、费力地宣传革命道理，用简单的语言，为求人们能听懂。他从不卖弄华丽的词藻，而是用通俗的比喻和日常口语。真诚、坦率比慷慨激昂更能感动听众。他

的讲话冷静，富有说服力，而且越来越有权威性。

经过几个月的宣讲，在人们对革命运动已有充分认识的坚实基础上，他在一位朋友何丰家里召集约三十人开了一次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决定在孙博士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正式的组织，名叫兴中会——复兴中华的会社。每个会员都要宣誓忠于这个组织和它的主义，随时听从领袖的指挥，竭尽全力为革命事业工作。

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它人旋即照办。他们多数是有能力的，朝气蓬勃、热情认真的年轻人，多少受过一些西方教育，是孙逸仙理想的伙伴。

在新成立的兴中会的以后几次会议上，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捐钱，听演讲，还要求亲自参与为中国的自由而战。

鉴于真刀真枪地干已属不可避免，人们提出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在兴中会内选出了一个姓叶的任队长，一个姓艾的任副队长，聘请一个丹麦人维克托·贝奇为教官。贝奇原是一个军人，这是一次真正的军事训练。中国革命的车轮终于跨越海洋，行动起来。

孙博士继续从夏威夷岛得到支持，在那年的六月已募集了六千美元。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笔款项，有的捐款者是倾囊相助。孙很高兴，打算在旧金山也这么干，在淘金热的年代很多广东人在旧金山定居。他希望象在檀香山那样得到加利福尼亚有钱商人的热情和忠诚的支持。冒着被清政府特务逮捕的危险，他愉快而乐观地单独出去旅行。他唯一的信念是

立即取得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

他的失败只能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以更大的魄力和决心继续奋斗。

四、加利福尼亚和英国

孙博士在檀香山时碰巧遇见了他过去的老师康德黎医生。康德黎夫妇回英国途中，在檀香山停留了一天。当康德黎带着他的妻子和日本女佣人乘马车在岛上观光时，人行道上的一个人向他打招呼，他们以为他是个日本人。他短头发，穿西服，留着短而漂亮的胡须。康德黎医生叫女佣人去问他有什么事。

孙笑着用英语和他们说话，他们还是没有认出他来，这时他只好告诉他们自己是谁。康德黎夫妇对他为革命运动所进行的新的努力非常关切，建议他到英国去宣传他的学说，并作为他们的客人。他答应去英国时一定要看望他们；但目前他要去加利福尼亚，那儿有很多中国人。

一八九六年他从夏威夷乘船去旧金山，他在夏威夷留下了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积极工作的中国社团。夏威夷岛上十之八九的中国人都参加了这个社团。

旧金山的唐人街——一个名符其实的“小中国”准备热情地接待他。他们很熟悉他的事迹。他的演说引起热烈反应，富人和穷人都来听，并且尽全力支持他。他们参加迅速扩大的兴中会，宣誓效忠革命并慷慨捐款支持革命事业。

孙博士还去加利福尼亚的一些边远城镇，在中国园林工人和农民中进行巡回演说，他又得到了忠实的支持。有些人只能提供很少捐助，但他们相信革命运动。这至少说明人们认识到革命需要支持和联合行动。这里的新会员也多起来了。

孙博士的下一个目标是穿过美国大陆去纽约，他在一些大城市停留，演讲和组织新的分会。所到之处，年轻人都非常热情，老年人也坦诚表示关心。当然，要老年人相信革命会取得成功是比较困难的。

在中国，革命有很久的历史，古代也时常发生，但它们都按照一定模式发展，说得少，做得少，有些是流血的，多数旷日持久，它们都同样以成就甚少而告终。孙逸仙要求废除一切旧传统，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中国的主张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多么可怕和奇妙！如果他获得成功，将是宏伟的成就，如果他失败了，人民将惨遭清政府的镇压。

孙逸仙的追随者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极度危险性，不仅对他们自己，而且对他们国内外的亲属。只要发现一点点蛛丝马迹，清政府就会毫不留情地满门抄斩。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效忠于革命事业和新领袖，决不畏缩。许多人把毕生的积蓄供给革命并献出生命。兴中会发展之迅速是惊人的。

在纽约，孙博士住在一个开古玩店的朋友家，这个朋友是他洛拉尼学校的同学。孙打算去伦敦。他没想到清政府在纽约的代表已得到他抵达纽约的消息。他们听他要去伦敦，就打电报给伦敦公使馆逮捕他。当然，孙博士启程赴英时对此一无所知。

通常他旅行时是非常小心的，他知道到处有清廷的特务，他订船票时用了假名，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感到在伦敦

很安全。这时他已听说，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曾想尽办法要抓到他送回中国去，而这个计划失败了。但孙博士不知道给驻伦敦公使馆打电报的事，认为自己很安全。

在伦敦，他去康德黎家访问，受到热烈欢迎，并被留住，待如上宾。

孙博士访问英国有两个目的，一是把当地华人组织起来，参加革命运动；一是，如有可能向英国同情者谋求资助。在这两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显著成就。在英国，中国人很少，至于他希望得到的英国军火贷款，英国人是友好的、同情的，但不愿卷入这一新的、前途未卜的事业。他们并不当面拒绝他，而是说要等一等、看一看，以后他可以再去找他们。

事情发生在十月一个平静的星期天。当孙博士去教堂时，一个中国人和他打招呼，问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自从孙博士剪去辫子，穿上西服以来，常常被当作日本人。他对那个中国人说他是广东人，那人说他也是广东人，他们边蹭边讲家乡话。这时又有一个中国人参加进来，这两个中国人要孙博士到他们家里去聊聊。孙博士说他要去教会晤康德黎。第三个中国人又加进来，第一个离开了。当经过一所开着门的房屋时，孙博士被剩下的两个人强拉进去。直到他们使劲关门上锁，他才吃惊地意识到他被关进了中国的公使馆！

自从收到华盛顿的电报，伦敦公使馆的人一直在找孙。他们向他宣告，他被捕了。在孙的身上搜不出一张纸片，他们很失望。他们知道在他寄居的康德黎家里一定有文件，立即派人去找，幸亏康德黎以孙不在为由拒绝了他们。

孙博士说，当时哈利戴·麦卡特尼爵士是他的主审官。

他告诉孙说他要被送回中国，上船之前一直要被关押。公使馆没有得到孙的文件，很懊恼，因为如果得到文件他们就能得到革命者的姓名、地址和活动情况而予以巨大的打击。

孙博士被关在公使馆楼上的一间房子里已有十二天。他听说他们要把他当做疯子弄上船送回中国。他知道，除非在上船前设法逃跑，否则肯定会在到达中国后被杀害。他决心要给康德黎医生报信。贿赂公使馆的人是不可能的，但他口袋里的钱物没有被搜走。

他的房间在临街的高楼上，孙博士决定给康德黎报信，他把写好的纸条包在一个硬币外面，扔到街上或人行道上，也许会被过路人发现。第一次失败了。不是钱币和纸条分了家，就是纸条扔不到地方。有一次成功地扔到街上，但被公使馆的人拣到，对他的看管更严了。孙博士几乎绝望了，他祷告，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遭受挫折最严重的一次。

公使馆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不可能再从窗口扔纸条出去了，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一天，他独自坐着，一个仆人进来给炉火加煤，一时冲动之下，他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这个人并请求他给康德黎家送个信。这个仆人小心谨慎，但他还是听完了孙的话，最后接受了孙的纸条和剩下的钱。这以后热切盼望而又焦虑不安的几个小时是孙博士一生中感到过得最缓慢、最漫长的时刻。

这个仆人干完活，离开了使馆。孙博士从楼窗目送仆人离去，他很清楚，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他给这个仆人纸条时，包进了一百五十英镑。他告诉仆人说：“我在这儿非常危险，他们要把我送回中国去并杀死我，这是我给唯一能帮

助我的好朋友的一张便条。他住在这条街上，如果你能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这一百五十英镑就送给你”。

仆人并没有直接去康德黎家，拿了纸条和钱回家去和妻子商量。幸好，他妻子是个精明、机敏的人，她说应该帮助这个可怜的人。她自己急忙给康德黎写了一张便条，拿上孙的纸条，披上围巾赶到康德黎家，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半钟了。她怕她的丈夫牵连到这件事情里，公使馆会找他的麻烦，所以她在便条上的签名是“一个朋友”。她把纸条塞进门里，按了门铃就离开了。

康德黎穿着睡衣下楼，发现了两张纸条。他立即换上衣服去伦敦警察厅，厅长说这与警厅无关，他们不能采取行动。康德黎很清楚孙的情况危急，必须争取时间，他在绝望中去外交部找他的一个朋友。最后他在这儿得到合作。他的朋友立即禀告索尔兹伯里勋爵，勋爵马上给警厅打电话要他们包围公使馆，救出孙博士。

这时，离孙被送回中国处死只有二十个小时了。警厅的便衣包围了使馆，一个戴礼帽的检察官员气势汹汹地急按公使馆的门铃。

见此情景，清政府大使吓得不知所措，他装病，叫他的秘书去大门口和蛮子打交道。我猜想，他们可能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我是警察厅的某某官员，大使在吗？”

“大使阁下病了，我是他的秘书，我能为你做什么？”

“好，我们了解到有一位孙博士，被你们关押在里面，我们要见他。”

“噢，检察官先生，大概是误会了，我们这里没有这个

人。”

“没有吗？那末，你不会反对我们搜查一下这所房屋，我们必须查明这些谣言。”

“可是，……你们无权搜查。”

“我们有许可证，如果不立即交出孙博士，我们就要彻底搜查。”

“这是对中华帝国的侮辱！”

“可能是，但你应该明白，你现在不在中国而是在英国！趁早交出我们要的人，对你和你的帝国都有好处！”

几分钟以后，脸色苍白但面带笑容的孙博士和他的朋友康德黎重逢了。〔注〕

这真是死里逃生。英国报纸把它当做重要新闻，广为传播。他们还要孙博士写一篇报道，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一瞬间，中国孙逸仙博士名扬海外，成为全世界谈论的话题。

孙博士对这一情况感到高兴，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因为他的事业终于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知。他希望这件事将使他更容易为革命争取援助。

他在康德黎家作短期居留，为了更好地进行他热爱的事业，不停地学习、工作。康德黎说孙从不浪费一分钟，他学习军事著作，宪法史、政治学，为把中国改建为共和国这一

— [注] —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获救过程，据尚明轩《孙中山传》载：当时的英国外交部、警察署完全站在袒护清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的立场，不理睬康德黎关于释放孙中山的要求；后来康投书《环球报》，消息公布后引起公愤，伦敦市民围住清公使馆，高呼：释放孙逸仙。英政府慑于舆论压力，迫使清公使释放了孙中山。

伟大事业作准备。他知道必须有人去向群众宣讲他主张建立的新型政府的基本道理。不管有多大困难和看上去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他梦寐以求的自由的中国从未丧失信心。

五、欧洲、海峡地区、重返中国

孙博士离开伦敦，到欧洲大城市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去旅行。但那些地方中国人很少，真正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是海峡殖民地特别是新加坡，有很多东方人和有钱的商人。

从欧洲银行界只能得到含糊的答复和空洞的许诺。他们盘算着怎么能借款给一个新的尚未成立的政府呢？他们的同情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能对他们自己有用处。

在海峡殖民地情况大不一样。孙博士再次在华人中找到关怀革命的忠实的支持者。他向富人、穷人都进行辛勤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募集了美金六万元。新加坡人认识到争取自由的斗争获得成功需要很长时间。奠定革命的基础是费时的，但他们情愿耐心等待。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的坚强堡垒之一，随时准备为孙博士提供保护和援助。孙也多次利用这个地方逃避清政府的搜捕。

认识孙博士的人都奇怪他一直在东奔西跑，他是怎样和这些散处各地的分支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呢？他不仅掌握各

地组织的活动情况，而且还使他们了解他自己的工作进展情况。许多信息通过夏威夷分会传递给国外的孙博士并向他提供活动经费。

孙博士从来不计较个人生活。以后的几年，我常常批评他出去旅行时往往身无分文，我对他说，作为一个领袖走到那儿向那儿要钱是不体面的。他常常笑道：“我不需要钱，我到那儿都能得到钱。”确实如此。当组织建立起来后，他凭个人的威信就能走遍天涯海角。当他需要时，人们总是为他准备好食、宿、旅费以及其他费用。而他除工作所需，很少提个人要求。

当孙博士第一次造反失败后来到夏威夷时，我的叔叔陆皓东已被清廷杀害。我告诉孙博士说，我想当大夫，学医。他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就是个医生，已经放弃行医了，有很多更伟大的工作等待你去做，如果你真想学点什么，可以求教于康有为，学政治和政府管理”。

康有为是个伟大的中国学者和开明人士。他曾被清政府起用给年轻的光绪皇帝当顾问，建立一个较现代化的政府。

我对孙博士说，我再去学习年龄嫌大了。他说：“如果你想帮助我，就在这儿参加政治活动，做社团组织工作。”我说我愿意干。此后我多年担任夏威夷社团负责人，在有需要时经常向孙博士提供经费。

谣传我父亲与革命有联系，清政府把他抓起来，这给我的工作增加了困难，我只能悄悄地搞地下工作了。尽管是在夏威夷，我也得留起辫子来，因为剪发是一种革命行动，可能置我父亲于死命，为了父亲，我留了十年辫子。

我可怜的老父亲早已退休，住在乡村里，当然，他与革

命运动毫无关系。民国成立后，他成为本地区的头面人物之一。有一天他在稻田边散步时被抓走，关在广州。幸而他是个读书人，能写，他们让他做些秘书工作。但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六年，我想尽一切办法争取释放他；最后，我通过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伍廷芳把他救出来了，但我已白白送给中国法庭一万块钱。

孙博士想在日本建立一个常设总部，因为，第一，日本离中国近，第二，横滨和东京中国人很多。那时东京有很多中国学生，孙认为如能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同情，是把他的学说传播到中国内地的理想途径。清廷布下了天罗地网要抓他，他出入国境越来越困难了。很多日本人对他很友好，资助他的事业并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尽管满清悬巨赏买他的头，孙博士仍多次回国。他常常化装、改名，但能不被发觉，仍属奇迹。他打扮成乞丐、苦力、渔民，有时还男扮女装。他知道亲自宣讲他的主义的重要性，因为整个运动主要是靠他富于感染力和磁石般的人格建立起来的。显然他总有办法使各种不同类型的听众理解他，但他很清楚他不可能到处都去，所以他集中精力把他的主张写出来，印刷成书，散发到各地向群众宣讲。

你可能认为这种传播方式太笨拙、缓慢，但考虑到中国语言的复杂性，这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四万万中国人，多数只懂他们本省的语言。中国没有统一的语言，即使今天也还没有。一个人当众发表演说，往往需再翻译成几种方言。当然北京话一直是官方和宫廷语言，但那时只有读书人和有闲的人才去学它。

识字的人虽然不多，但每个村子里总还能找到个能把读

能写的人，他可以用方言把文字翻译给当地人们听，因为方言因地而异，但文字都是一样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语言一旦写成文字就可以家喻户晓。中国人民终于团结在新领袖的旗帜下，有了革命的觉悟。在清王朝枷锁下长期沉睡的狮子慢慢地觉醒了。沉睡了二百六十年的中国又开始抖动了。

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失败，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中国本身，表明了进行某种变革的重要性。不变革，中国将被灭亡或被瓜分。甚至清廷也觉醒了，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的指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维新变法”。一八九八年九月，他颁发了废除官员考试中专考中国古文的制度，鼓励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教育，设立学校和训练新军。

这些都是激烈的改变，事实上，过于激烈了。很多人感到必须慢慢地，而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但清廷内少数维新派的急速行动是有道理的。他们知道狡诈的慈禧太后要阻止他们，他们要避免受阻。年轻的光绪帝命令他的将军袁世凯在实施改革时派兵包围皇宫，囚慈禧太后。这一计划如果成功将是一个大胆壮举。但是，袁世凯这个两面派，不讲信义的人，决不失去他用钱买来的官职，认为这是他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谋取私利的好机会，他偷偷跑到慈禧那里去告密。他告诉慈禧说，光绪帝命令他处死她。这是最大的叛逆，慈禧现在掌握了必须由她自己再度亲政的充分“证据”。在袁世凯的紧跟之下，她立刻采取行动。年轻的皇帝被囚禁。悬巨赏抓康有为和他的兄弟，其他五个变法者被杀头。康有为逃到一艘英国船上，象孙博士曾做过的那样，流亡去日本避难。慈禧太后很快宣布废除新政。

孙博士继续写他的革命理论，在中国内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热情的读者。他常常引用中国经典著作和中国历史来阐明他的思想。他解释说人民需要改善生活和受教育，需要更多的自由以求进步，而中国只有进步才能生存。过去他耐心地指出，如要推翻腐朽的政府，人民应有信心，现在，他教导人民还要勇于采取行动。

在孙博士领导下，此伏彼起的革命行动继续进行，再接再厉，直至最后胜利，最初的几次，多由于仓促不周的计划和缺乏配合行动或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

有一次装武器的桶破了，武器暴露在船甲板上，只好取消行动。第二次是由于两支队伍在关键时刻没有配合好。又一次是由于仓库里的弹药爆炸。一连串的失败使一些最忠实的革命者也丧失了信心。在欧洲，孙的革命运动一时传为笑柄——妄想赤手空拳移山倒海，谈何容易！

但孙博士毫不动摇，每次失败都只能使他的热情更高涨。他顽强地前进，给他们的组织加劲，用自己的决心铸成的热情与力量激励他们勇往直前。

中国大地正在剧烈动荡，新世界再一次向人们招手。

六、 美国和欧洲的组织

自从光绪帝的变法尝试遭受失败后，尽管慈禧太后果然对清廷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还是使世界列强和中国人

自己认识到旧政府的统治不会太长久了。

通过被迫割让，失去台湾和朝鲜，中国向世界暴露了她的虚弱。一八九七年中国把胶州丢给德国。一八九九年把广州湾丢给法国。甚至憎恨西洋办法的慈禧太后也感到中国需要保护自己了。

她有两个直接反对朝廷的敌人——孙博士和康有为。康有为在日本宣传君主立宪。“蛮夷”的荒诞不经的政治体制激励了孙、康这些简直无法无天的人。她对蛮夷恨之入骨。因此，她更乐于采纳那些巧言令色的权臣为帮助她驱除可恨的洋鬼子而献出的计谋。在她看来，洋鬼子是一切麻烦的罪魁祸首。

当紫禁城里正在酝酿和发动变法时，孙博士继续从事推翻清政府的计划。在皇室动乱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要抓住一切时机。

他又从日本去夏威夷、美国和欧洲。他的第二次世界旅行比第一次成功，因为世界已承认孙逸仙的声望和他为中国献身的事业。

当他到达旧金山时，他发现不仅中国人对他的演说非常感兴趣，一些美国人也感兴趣。一天晚上他演讲后，一个驼背的美国青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来找他说：

“我很钦佩你为中国所做的事业，我愿意把我的命运和你联结在一起。”

这两个严肃的年轻人意气相投，彼此敬佩。

这个美国人是被两个中国青年学生带到会场的。他们向孙博士介绍说，他的名字叫霍默·李，是一个天才军事家。孙博士不久以后就任命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做他的军事顾问。

他还安排两个即将从纽约回国的年轻人陪霍默·李去中国。

孙博士沿着过去走过的路线从旧金山去纽约，在每个大城市停留，向他的追随者发表演说。所到之处革命运动得到发展，会员人数大大增加。当地财务人员继续为革命事业募集资金，孙博士自己对其组织发展之迅速也感到惊奇。

和美国一样，欧洲也较上次更热烈地欢迎他，但银行还是不肯定答应给予财政援助。他们同意给，但还是要等一等，看一看。

运动的表面的成功，在局内人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用处。一次次的失败却使坚强的追随者气馁，很多人劝孙博士放弃斗争，但他仍决心继续干。由于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最后带来了革命的成功。

很多人倾向于把这次革命看作仅仅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但当你认真地考虑到各个工作领域中遇到的巨大困难，你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变革。

想一想中国是从多么落后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的。一个思想活跃的广东农村青年，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得到另一些也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青年的拥护。这一小群坚韧不拔的人竟敢于向两千年的传统挑战。你可以想象在这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着四万万人口，他们大多数是文盲。没有统一的语言，资源未开发，交通不发达。这是一片沉醉于祖先创建的丰功伟业的土地，在为了与世隔绝而修建的长城后面沉睡了许多世纪。几千年的文明受到了一个人的思想的威胁。这个人不仅要改变中国政府，而且要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难怪国内外人们要怀疑它的可能性。更奇怪的是，尽管力量如此悬殊，

世界竟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心甘情愿和这个坚强的年轻领袖孙逸仙共命运。

自从失去朝鲜，清廷不得不承认应向先进国家学习。这对慈禧太后来来说是一剂苦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试图变法以来，她对所谓“蛮夷”的憎恨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她认为时机成熟，可以采纳她的宠臣端亲王的建议，把所有的洋鬼子统统赶出中国。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暴动在北方开始，反对白人和中国基督徒，直到美、法、英以及其他国家的联军镇压暴动，并进军北京。

满清皇室一度被迫逃往西安。即使遭到失败，慈禧太后依然是顽固、狡诈的统治者。她囚禁光绪皇帝，继续悬赏捉拿孙博士和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因为孙博士的年轻的美国军事顾问参与了义和团事件，慈禧还悬赏一万元捉拿霍默·李。

义和团举事初期，孙博士在国外，他回到设在日本的基地。三个造反派，孙、霍默·李、康有为此时都在日本避难，筹划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孙博士找康有为商讨，可否把两股力量联合起来，但康有为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孙博士要同旧传统彻底决裂，建立真正的共和国，而他认为中国还不具备这种剧变的条件，他们主张君主立宪，让光绪皇帝复位。霍默·李现在是将军了，他从军事观点来看问题。他说当前团结比个人变革中国的主张更重要，不管新政府将是什么样，满清王朝必须打倒！

当霍默·李明白合作已无可可能时，他告诉孙博士说，他要回美国，在那里他能更有作为，为革命训练军事干部和筹

集经费。他建议这些志愿队伍将来可以秘密地渗进清朝军队中去。当发动革命时他们将有助于瓦解满清军队。当孙博士在继续为建立共和国努力时，康有为和他所成立的保皇会或“拯救年轻皇帝会”（旨在使光绪帝获自由）却在宣传改良主义。

孙博士离开日本前，把黄兴将军介绍给霍默·李，当李的二把手。黄将军是个骁勇善战的人，忠于孙博士和他的事业。

黄兴是个出色的击剑手，他曾在日本学习击剑，用重量级的武士剑练习，使肩膀和手臂的肌肉非常发达。他很沉静、干练，是孙博士赋予军事重任的忠诚战士。在中国和在国外招募的部队都由黄将军直接指挥，而由霍默·李将军制订作战计划和最后执行作战计划。

当霍默·李将军回到美国，为中国革命秘密组织和训练军事干部时，孙博士继续进行他的此伏彼起的革命暴动。这些暴动都失败了，但在中国内地，人们对他的革命运动更关怀了。他计划在一九〇〇年秋天举行一次起义，一部分由日本和高加索同情者组成的由外国军官训练的队伍已作好战斗准备，虽然只派出一支小部队，但他们认为一旦打响，当地的热情的中国部队会参加进来。这批革命者隐蔽在澳门附近，等待着孙中山的到来。

孙博士从横滨乘船出发，但到香港时因清政府警告英国说，一次叛乱正在策划中，英方不让孙博士上岸。清廷特务搜查严密。孙博士设法溜上了岸，但他发现携带起义所需经费的财务人员也被拒绝在香港上岸，而且被迫去新加坡了。孙跟随这个财务人员去新加坡，发现这个财务人员被捕，

钱被当局扣留。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孙博士想尽一切办法弄回这笔钱，他对当事官员说这是他做生意的钱。他成功地取回钱，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他匆忙地乘下班船回香港，他未费周折上了岸，但英国人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他不能直接去同他的部下接头。他派人通知改变会议地点，但未能预料的拖延使他等待得太久，突然袭击已不可能，而革命部队是把突然袭击作为他们进攻的主要方法的。清廷特务就在附近。广州政府当局立即派出军队截击这支革命部队。四千名皇家军队很快击溃了这支由六百名革命者仓促组成的小部队。

孙博士和他一起逃出来的伙伴再次被迫去日本和新加坡避难。皇室对各入境港口施加压力，孙博士几乎无法上岸或停泊。甚至一些有租界的中国口岸也对他关闭了。最后，日本也拒绝他上岸，但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孙博士还是回到了在横滨的总部。他立即投入下一次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和约，赔款四千五百万两银子（应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译注）。这是皇室统治的又一个奇耻大辱。有头脑的中国人更多地考虑改革的价值了。

在不成功的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七年的起义过程中，霍默·李将军在美国，康有为在日本，黄兴将军在中国一直辛勤地筹款集资，训练队伍，保持旺盛的革命火焰。

一九〇四年孙博士为筹集开展革命活动所需要的二百五十万元而去夏威夷、美国。他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对霍默·李将军训练从旅美华侨中招募的志愿部队的进展情况感到惊喜。除了在夏威夷有一支部队外，居然在马尼拉也有了一支

部队。他们以前从未受过军训，但他们成为出色的部队，尽管他们多数是用扫帚棒开始训练的。

一九〇五年春，孙博士去欧洲，他再次寻求银行的支援。他的收获甚微。欧洲的银行仍是委婉拒绝，但他们确实佩服他的坚韧不拔。孙博士在欧洲宣讲他的“三民主义”或五权宪法，模仿美国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他在安特卫普建立了第一个分会。在柏林，有三十人宣誓入会。在巴黎建立的第三个组织有十个会员。终于，可以宣称参加革命运动的会员真正具有世界性了。

由于经常实践，孙博士成为出色的、强有力的演说家。他的演说不仅有说服力，吸引力，而且善于鼓动听众的激情并使听众受他支配。他的名字在全国，在国外华侨中家喻户晓，在欧洲和美国，他深得人们的同情。

他之受人尊敬，在某些情况下因为他是基督徒；又因他懂英语；更因为他是个先进人物，为拯救中国而奋斗。但一些聪明的领导人出于私心，认为还有应支持他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一旦孙博士的革命成功，他将成为中国的领袖，应该随时准备去讨好一个胜利者。

和中国签定贸易条约或通商口岸协定的国家对中国的未来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们认识到即使是一个衰弱的、不稳定的、治理不善的中国，从经济观点来看也还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有潜力的国家，必须承认它在世界力量平衡中的地位。他们开始认识到，如能实现其宏图大略，孙博士无疑将领导中国。银行家也终于作出了选择，看来国内外忠诚的革命人士无须再为财务重担发愁了。

七、家庭

我想至多用很短的一章来谈谈孙逸仙的家，因为我有幸非常熟悉他们。

中国家庭是个关系十分亲密的小团体，甚至今天还是这样，每个成员是整体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在家庭里有其固定的地位，从不超出一步。我将从家长，孙的父亲开始。

孙博士的父亲孙达成是个贫苦忠厚的农民，也是村里的一位长辈。我记得这个老人，手里老拿着一把扇子，边走边用扇子拍打大腿。按照中国方式，他耕种大约三英亩半土地，收获的大米要与地主分享。

村里大部分房子是砖瓦房，但没有树木和草地。在孙达成的房子的一边，三个香港富商盖起了三幢四周有庭院的大房子。我记得我们常常去那里，象进了公园一样。

除了妻子和孩子，孙达成还把两个哥哥的妻子接到家中。她们的丈夫出门碰运气，再也没有回来，就由小叔子来供养她们了。两个哥哥，一个去加利福尼亚淘金，肯定死在那儿了。另一个去宁波，从此没回来。那时候通信极慢又不可靠，这两个妇女直到死也不知道她们的丈夫的命运。他们的失踪使人们感到外部世界是可怕而悲惨的。孩子们想离家必须同家人做斗争。

孙逸仙的母亲是家里第二号人物，她来自邻村，身材匀

称，容貌清秀，皮肤黝黑，有着一双传统的缠足。后来，人们给她画了肖象。她活到八十多岁，但不幸在她儿子成为大总统以前就去世了。

阿眉（孙眉）是长子，次子很小就死了，孙逸仙有个姐姐后来又有一个妹妹。

孙眉第一个出国，象当时村里许多人选择的一个样，他选择了去夏威夷。他是个勤劳的年轻农民，在檀香山定居。他一去就发了财，并回村招收更多中国劳工去夏威夷农场劳动。回到檀香山后，他在莫衣岛开了一个店做生意，赚了钱又在库拉附近买一个大牧场养牛。他是莫衣岛上第一个经营牧场的人，而且非常成功。

我记得孙眉接他母亲去夏威夷探望他的事。他的妻子也是邻村的，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母亲对莫衣岛的印象很好，有人猜想，要不是为了另一个儿子，她会背井离乡在那儿住下来的。

她回到村里，我们都去听她讲见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印象最深的竟是夏威夷的活动房子。她说他们的房子和我们的不一样，是用框架搭起来的，可以从岛的一头搬到另一头。

当孙眉让他的弟弟去夏威夷上学时，他当然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希望孙逸仙和他一起做生意，他甚至慷慨地分了一半产业给他的弟弟。然而，可怕的事接踵而来，首先是孙逸仙要做基督徒，后来是捣毁神象。他把弟弟叫来，申斥他，并要他退还财产作为惩罚。孙逸仙情愿归还财产并当着律师的面签署了文件。他对孙眉说钱财和产业对他毫无意义。他这种看法始终未变。在孙眉这样一个辛勤的商人和牧

场主看来，他弟弟是个幼稚的大傻瓜。孙逸仙则反过来想说服他的哥哥，改变旧秩序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孙眉不听他的，他坦率地表示对弟弟的行为感到吃惊和厌恶。

孙逸仙回到广东去学医。后来他去北京，他向政府上书要求改革教育和农业，遭到失败。当他认识到只有靠力量和行动才能改变现状时，他再次到夏威夷找孙眉。他已是个演说家了，他虽不懂生意，却能说服孙眉改变主意。从此孙眉成为第一个支持他的商人，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忠诚地为革命工作。

当孙逸仙还在学医时，他的父亲去世，活了七十多岁。妻子成了一家之主，她写信告诉孙逸仙说已为他选了一个新娘。

这样为儿子选妻子，西方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但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过去现在都在这样做，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这种办法往往是成功的，因为通常是两个社会地位、爱好和信仰相同的家庭结为姻亲。

孙的母亲为他选择的女孩来自邻村，一个农村姑娘，皮肤比孙的母亲还黑一些。

娶亲的过程是冗长和严肃的。首先，孙的母亲托媒人去问姑娘的生辰八字。女家把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交到男家。

一个月内男家要请算命先生来算一下姑娘的命相与男孩是否相配。如果合适，男方就请媒人问女方母亲需要多少订亲彩礼。新娘的母亲则要给新郎做一套衣服。如双方同意，新郎就备一顶花轿到新娘家，把新郎的生辰八字和彩礼也带去。

新娘盖上红头巾被娶回新郎家。花轿到时放鞭炮迎接。

新郎打开轿门，一位老年妇女领着新娘，跨过一小堆篝火，直接进新房。最后才请新郎进屋与新娘相见。

男宾和新郎的兄弟们陪同新郎进新房。新郎用扇子挑开新娘的红头巾。这时他才第一次见到新娘的容貌。但他马上又和陪同人员一起离开新房。新人的合欢宴稍后举行，为了交好运，新郎首先应夹一块鸡肉。女方请来的一位妇女祝福新婚夫妇和睦相处，随后客人离去，只有近亲和远道来的客人留下。

新郎新娘回到新房。第二天早晨新娘还有另一套仪式。按习俗她要给婆婆端去洗脸的热水，并送去茶和甜食。随后新郎和新娘穿上最好的衣服向双亲和长辈叩头表示他们对老人的服从和尊敬。

三天后回娘家并最后一次宴请至亲。

建筑在家庭纽带和经济稳定基础上的中国婚姻和西方旋风式的恋爱迥然不同。由于这种方式郑重其事、世代相传，夫妇之间往往能建立深厚的感情，白头到老。我相信孙逸仙是欣赏他的新娘的许多贤惠品德的，若不是渴望学习和致力革命工作，他们会彼此更好地了解的。事实上，孙结婚后立即去香港完成他的医科学业。卢氏(名卢慕贞——译注)留在翠亨村孙的家中。他们生过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名叫孙科。做父亲的很少回家，他的妻子和母亲自然会经常抱怨。我认识的朋友中没有人比孙更和气、更体贴别人了。如果他从事的工作不是为了救中国，而是其他工作，我想他会常常回家，使家里人高兴的。但他关心中国的前途，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他背离他的目标。

当第一次起义准备就绪的时候，他意识到任何差错都会

危及家庭。他让他们离开翠亨村，搬到香港去，希望他们能在英国租界地内安全生活。

孙老夫人抱怨他的儿子没做好事，害得他们离乡背井。他们在香港租住的房子并不象孙希望的那样秘密。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清廷特务要来搜查，幸而房主是个英国人，他要他们出示证件，否则不准搜查，并声称如搜查不出东西来，他要控告他们；特务们只好离去。

孙感到租界也不安全，因而把他们送到夏威夷孙眉那里去。

当然，要她们到国外去生活，这两个妇女更不乐意了。她们的抱怨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减少。我到孙眉家去看望她们时，老妈妈常对我诉说她对儿子的行为感到失望和焦虑。可怜的卢氏则提起革命的事就哭起来。这两个妇女不了解也不关心孙逸仙的工作。在中国，妇女是不过问政治的，她们的生活圈子就是家庭。卢氏则感到她受骗了。当然，用普通人的眼光看，她的生活确实不寻常。她有孩子，和婆婆以及孙眉的妻子儿女住在一起，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丈夫对她比什么都重要。她经常为他担忧受怕，但又不能对他有所帮助。要做孙的称职的妻子是困难的，对任何妇女都是困难的，对于一个对婚后生活急剧改变感到困惑不解的农村妇女来说，就更加困难。

孙逸仙一直很喜欢他的孩子，尤其是他的独子孙科。他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他父亲送他到檀香山的一所天主教办的圣路易学校去上学，以后又上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

孙的两个女儿，一个很小时就死了，另一个是戴恩赛的

妻子，戴曾任驻墨西哥大使。

革命胜利后，孙的家属多数回到中国。孙眉在澳门定居，他的母亲也住在附近。她在孙任大总统以前去世。卢氏现在还住在澳门，孙科和他的家属也住在那儿。象其他许多革命的同情者一样，他们在一九一一年结束了流亡生活。

对孙博士一九一四年（应为一九一五年——译注）在日本与宋庆龄结婚，有很多议论和批评。当庆龄的姐姐，后来成为孔夫人的葛龄是孙博士的秘书时，我见过她，我没见过庆龄。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不仅能很好帮助孙从事伟大的工作，并且能展望未来。自从她的父亲宋查理成为孙的密友以后，多年来孙对这个家庭很熟悉。当然，在中国人看来，遗弃对自己忠诚的第一个妻子是不合体统的，但年轻一代人解释说中国已大踏步前进，摆脱了旧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否定这两种见解。它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孙逸仙一生中从未做过自私的或见不得人的事，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贡献给了中国。我知道中国是感激他的。

八、 为一九一〇年作准备

革命党人在孙博士的领导下终于到达了胜利在望的阶段。他们在国内外的组织是强大的和生气勃勃的。随着孙博士及其追随者的力量和人数不断增长，很多美国人和有影响的欧洲人也看清了清廷统治日益不稳，开始同情和帮助革

命。人们看到这时期的孙博士品格高尚，对事业无限忠诚，专心致志，他的道义力量和完美形象把他的朋友们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谁也不能分开他们。

一九〇八年，又一个有利条件产生了。慈禧太后去世。那一年她在宫廷医生和太监李莲英的帮助下毒死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把一个三岁小儿溥仪扶上宝座。为了保护清廷，她下令召开严格控制的咨政会（假议会）。正如孙博士所料，这个会议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由于孙博士的著作、讲演和报纸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这时的中国对清廷的假允诺不再保持沉默了。孙博士的第一张报纸《中国每日新闻》创办于一八九九年。他委派陈少白去香港任主编。

那时他旅行还有困难，甚至日本都不许他入境。他采取习惯的不事声张的做法，尽可能隐姓埋名地到处奔波，亲自检查革命起义最后一分钟的细节。

霍默·李告诉他，美国的军训学员已准备就绪，请他去视察。黄兴将军在国内的武装力量也集结待命。康有为在美国视察他的保皇会，但光绪皇帝死了，霍默·李想让康有为和孙联合。孙博士不需要康有为，他有他自己的更强大的追随者，而且康有为肯定对他无助益。但孙博士还是看到了，一旦中国对世界宣告其自由，形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是有利的。

康有为不象孙博士那样虚心、谦逊，他去美国，穿着学者、清廷顾问的礼服，他使沿海城市的广东人闻名惊然。他住在纽约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套间，举行豪华的宴会、招待会，这就是康有为在美国的形象。在美国的华人很

快发现这个领袖不象孙博士那样衣着朴素、沉静地来到人们中间，发表激动人心，充满信念和希望的演说，然后在夜里悄悄地离去。虽然康有为有着显赫的背景，但他没有给人们留下象孙逸仙那样持久的、可亲可敬的印象。在霍默·李的中国部队中，人们看到康有为不懂军事而感到不安。许多人认为，由一个非军人当领袖是危险的，他们对此不满。于是，原来参加保皇会的人现在准备参加孙博士的党了。

霍默·李将军尽力迎合康有为这个显赫人物。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手法，目的在于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正忙于为革命作最后努力而悄悄工作的孙博士那里转移开。正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要会见康有为，这给霍默·李将军陪同这位改良主义者去纽约找到了合法的借口，而霍默·李纽约之行的真正目的是会见孙博士。

在孙逸仙盼望最后解放中国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洛杉矶停留，向当地忠实的革命者发表演说。他过去曾多次向他们讲演，但都是化装的。这回不仅是一次盛大的华人集会，还有一些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应霍默·李将军的邀请夹杂在人群里听讲。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孙的未经化装的真实面貌。

听讲的人说他的讲演是动人的、尖锐的、漂亮的。听到他冷静、真诚地宣誓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人们认识到这个人不仅适合领导他们进行革命，当革命成功时，也是中国最合适领袖。

在纽约会议后不久，孙博士、康有为和霍默·李将军之间又为建立共和还是民主立宪的中国展开了争论。李将军对康有为说，你的追随者大部分已转向孙博士，光绪皇帝已

死，“拯救年轻皇帝会”已没有理由存在。李将军直率、有力的论证和孙博士冷静、合乎逻辑的说服，终于使康有为同意尽力帮助建立共和国。

领袖人物的分歧消除了，孙博士决定发难。他和李将军相信这次定能成功。他们已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劳动，为这一斗争奠定了基础。以往的错误教育了他们，他们不会再中敌人的圈套。中国各地密布着李将军训练有素的军官和黄兴将军斗志昂扬的部队。北京城里，甚至清朝军队里都有革命的同情者等待着一声召唤。人民已作好准备，全世界的华人都决意追随孙博士从事解放中国的运动。对孙博士来说，剩下的事是筹措贷款和签订贸易协定以保障新政府一旦成立即被承认。

为此目的李将军去欧洲，孙博士去美国。李应德国威廉皇帝的邀请去视察皇家军队，可以公开旅行。他的名著《愚昧的勇敢》于一九〇八年出版，此书对现代战争进行了惊人的科学分析，使他获得世界声誉。

象以前发生的那样，命运又注定他们的计划要出岔子。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当孙博士在丹佛时，接到黄兴将军的一份电报。由于电码本锁在箱里，他误认为这是一份例行公事或申请经费的电报，决定明天早晨再说。他下楼到餐厅吃早饭，口袋里还装着那份未译出的电报。当他看到晨报的头条新闻：“革命军攻克武昌”时，立即买了一份报纸，读了那条报道他一生的梦想已成为现实的消息——在万里外发生的事情。译出黄将军的电报，他发现电报证明新闻是确的。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黄兴将军率领部队攻克了广

州的总督衙门。虽然黄将军失去了两个手指，他的敢死队牺牲了七十二个人（后来葬在黄花岗），但仗打得英勇顽强，向紧张不安的清廷显示了新的革命军的气势和能力。清军的对手不再是乌合之众，而是受过良好训练和久经考验的部队，决心坚定，斗争昂扬。

黄将军的队伍因寡不敌众而溃败，要求再战，但黄将军要求他们暂时克制，直到十月九日一颗贮存在汉口俄国租界的炸弹意外地爆炸，给革命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革命总部立刻遭到袭击，三十名会员被捕，会员名单被搜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剩下的会员以孙逸仙的名义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起义，通知各省掌握军权。几星期后，十五个省被革命军占领。他们到处取得成功。皇帝军队不堪一击，众叛亲离，被迫承认失败。

孙博士最初想尽快回国，但他不是个有私心的人，经过考虑他认为还是先去欧洲帮助李将军做好财务和商务工作对国家更有利。

这是中国的伟大节日。中国终于向世界各国展示了真实的力量，她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自由的、和她们平等的国家！

九、革命成功、孙被推举为第一任总统

孙博士立即去英国，一到伦敦，他就去康德黎家。

几天来，已有一些给孙的电报送到康德黎家，在他来到之前，有一封电报错写成“满清使馆孙文收”，因为是让康德黎夫人转交的，她不能证明孙在使馆，送电报的人要退回去。康德黎夫人吃力地抄下了这份中文电报后，把原电退了回去。孙来后，她把这份电报给他看。第二天早晨孙才满足了她的好奇心，谦逊地告诉她，电报内容是请他担任第一任总统。

康德黎夫妇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但孙博士说，他只答应暂时担任，而且只是在找不到比自己更合适的人时才担任。

李将军在伦敦和孙博士会合，他们要尽最后的努力为新生的政权筹集急需的贷款。银行方面告诉他们，首先他们必须证明新政府是个设有常任总统和国会、充分行使职权的政府，而不是“临时”总统和国会。这样，孙就必须先回中国。因此，他希望奉献给新共和国的钱未能到手。不过银行答应立即停止给清廷贷款。

由李将军陪同，孙博士从法国乘船，经苏伊士运河回国。这是一次胜利的旅程。当船在新加坡停泊时，孩子们向他脚下抛掷鲜花，到处是欢迎这位胜利英雄的快乐的笑脸。在一片欢呼声中，孙博士心里高兴，但仍然谦虚谨慎。他不象很多人那样以为斗争已结束，他看到中国面临着更艰苦的斗争。

经历漫长的艰苦岁月，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第一次公开用他的官名：孙文，在上海上岸。他立即被拥为新共和国的当然领袖，受到热烈欢迎。

当问他是否带回新政府急需的资金时，他悲哀地回答

说，他只带了他自己回来。但他说钱会有的，只要永久性的新中国政府建立起来，并得到正式承认，外国就会提供贷款。

五天后，十七个省在南京召开会议，选举孙逸仙为中国第一任总统，选定南京为新的首都。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节日。经过如此精心计划和执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革命，中国终于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经过多年艰苦努力、自我牺牲，这个凭理想和梦想驱策自己的农村孩子孙逸仙，领导他的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希望建立一个安定自由的共和国。

当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明孝陵举行总统就职庆典和检阅时，他意识到他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中国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他迫切地盼望他的新生的共和国能生存下去。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更担心的是这个国家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未来的生活。

这时檀香山的公司给我一个假期，我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和二十个同盟会的海外会员一起乘船去中国，还带着孙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

我们一到中国就去南京，发现孙已陷于众说纷纭之中。

孙博士初步制订了一些人们盼望的法令……采用世界通用历法、剪辫子，禁止缠足。这些大家都满意。但总统的顾问们分裂为两派。

从海外回来的年轻进步人士忠实地追随和献身孙的事业，要求彻底改革和建立完全新型的政府。中国老年学者希望新政府取用旧制度中的好东西，使中国有机会去逐步适应改革。

孙怕犯错误危及新生的共和国，生平第一次小心翼翼起来。他认为这些老人长期在宦海中浮沉，是有经验的。甚至一些年轻人，包括孙的秘书和笔杆子汪精卫也赞成老办法。

少数人包括军人、李将军、黄兴，他们指出应立即挥师北上，完成驱逐北京清王朝势力的工作，统一全中国。他们告诫孙说，如不立即行动，整个事业将遭失败。现在不干，将来又得从头干起。

国内的顾问们说，采取军事行动要化钱，而目前没有钱。还说现在已控制了中国，可以安于现状了。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立即为世界所承认，至于征服一小撮吓破了胆的清廷人员和北方各省是轻而易举的事。

多么可悲的劝告！这一小撮亲北方的人在未来中国的统一问题上制造了分裂。如果那时采取步骤把全国统一起来，就不会有以后多年不能统一的问题了，中国在政治上也会先进得多。

孙和其他许多人听信了这些人的劝告，取消了一切军事进攻，铸成大错。不久，李将军突然犯病，回到美国后去世。行前他再次告诫孙切勿放弃进军北方。

我知道黄兴将军也有同感，我听到他和总统办公室的汪秘书通电话。总统秘书生硬地告诉他说，总统命令他停止军事行动。黄兴将军提出质问，汪回答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你要怎么样？”并挂了电话。

第二天黄兴将军患出血病，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对这件事焦虑愤懑而引起的。

作为朋友和军事领导人，黄兴一直全心全意效忠孙博士。这次，他象过去一样听从指挥，但完全是违反他自己的意志

的。

停止军事行动使一个人立即得到好处，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是清军的指挥官，一个有实力的奸猾狡诈的人，常常能使事态变得有利于自己。他认识到新共和国已站稳脚跟，便很快入伙。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简单谈谈这个人的背景。他不仅是个投机者，而且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确，没人能说清楚孙博士和袁世凯是多么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袁世凯是北方人，祖籍河南省，出身小官吏家庭，祖父辈当过大官。袁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花钱如流水，嗜赌成性，一夜之间就把妻子的首饰赌光。不巧妻子第二天要回娘家去为父亲祝寿，她父亲也是做官的，很有钱。按照习俗，他的子女和客人都穿戴最好的衣服和首饰去给他祝寿。袁的妻子没有首饰了，只好穿得普普通通地去了。她父亲的一个丫头问她为什么穿得这样简单，她受不了，没见父亲就气得哭回家了。她当然知道她的首饰怎么会没有的。很奇怪，她是袁世凯惧怕的一个人。

袁回家时发现妻子哭得很伤心。她大骂袁世凯，迫得袁不得不吹牛皮说，如果有机会，他也能去北京得个一官半职。他的话使他妻子感到惊奇，她从积蓄中拿出五百元交给他并嘲笑说他决不能成功。

受妻子的刺激，袁世凯立刻动身去北京。到北京之前赌博、喝酒已花掉三百元。但他的一生却老是见鬼似的那么走运。在北京他找一个当官的河南朋友商量。这个朋友劝他进军校，因为袁的叔父是个高级军官，可能会帮助他。袁认为这个办法既慢又笨。他又去找老学者徐世昌商量。徐后来成

为光绪帝的老师。徐说如果他想通过正式考试，得学习各种经典。袁又感到为难了，他请徐给他一本应付考试用的材料，他说他可以用抄袭材料的办法来通过考试。

徐世昌说，如果考题正巧出自这本书，那就太好了，但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袁真运气，考试题就出在这本书上，他抄书通过了考试并得了官衔。后来，他又入伍当了军官，在他叔叔的关照下，去朝鲜当中国驻军的指挥官。

他在朝鲜故态复萌，得罪了日本大使。由于他玩忽职守，朝鲜丢失。他逃到上海，很快买通太监李莲英恢复官职。这个太监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他从袁世凯那儿源源不断地收取重贿，保举袁任御林军总监，负责训练新军，即后来的北洋军。

我已经讲过袁世凯如何背叛了年轻的光绪皇帝，隐瞒自己的实情向慈禧告密。在慈禧的新随从中，袁成为清廷最有权力的人。最后，当慈禧去世，袁世凯看到如果他的阴谋得逞，他有机会能当上皇帝。

慈禧留下了一个儿皇帝溥仪，由其父摄政，直至溥仪能执政为止。溥仪的父亲察觉袁阴谋篡位，对他疑惧深重，甚至一度想把袁杀掉。后来袁辞官回河南老家，直到革命爆发。

革命爆发后，那些皇亲国戚们吓坏了，其中一位庆亲王亲赴袁的老家，要求他回朝领导皇室军队。

这时袁开始漫天要价了。他说如果要他回去，他不仅要掌握全部军权，还要控制皇室。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他，他回来了。但他是在窥测时机，当明确看到胜利属谁时，他立即和革命党人进行交易。袁世凯是个有经验的政

客，当他声称自己是衷心拥护共和的，可惜过去做了错事时，孙博士相信了他。

孙博士相信这种人的唯一原因是孙本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节操，他相信所有的人。袁世凯是个见利忘义，不择手段的人。他狡猾、奸诈，善于幕后操纵。孙博士的秘书汪精卫欠了袁一笔人情债，袁曾救他的命，使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所以袁很容易地说服了汪，使汪设法怂恿孙让位给袁当中国的总统。

还有一些人象孙那样很相信袁世凯，但是年轻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参加军队的人，不受蒙蔽。他们了解袁世凯醉心于大权独揽，无意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他企图以军队控制全国，为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扫清道路，象清王朝那样统治人民。

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上，他唆使他的代表提出君主立宪制度。但南京的代表伍廷芳要求首先承认共和国，然后再讨论政府的形式。袁的代表只好同意。袁一怒之下，召回代表，用打电报的方式参加以后的会议。

孙逸仙和他的多年的追随者之间的裂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和一些孙童年时代的朋友以及海外回来的人去孙那里恳求他不要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这样的人。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从下午七点到十一点，和他辩论，要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孙说：“你们华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袁世凯是个有能力、有经验的人，而且是他利用权势迫使皇帝退位的。这是很必要的，它向世界表明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个临时的。”

在汪精卫等人的怂恿下，要孙改变主意很困难。我们问他是否至少他应派部队到北方去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

他告诉我们说财政困难，不允许进行北伐。我们说过去我们募过款，我们可以再去募款。总统的秘书汪精卫又一次以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为借口表示反对，孙听信了他。后来的事实证明汪是个软骨头，他成为日本的傀儡。在共和国历史的最初关键时刻，孙的周围竟是这样一些人物，是很不幸的。

很多华侨回来帮助孙，看到留下起不了作用，又离开中国去海外了。因为我的假期未满，我又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孙要求人民接受袁世凯不是一下子行得通的。这个人不受欢迎，报纸用很长篇幅揭发他的真正的品质。为克服这些困难，孙命令他的秘书在报纸上宣传袁的政绩，为他当总统候选人树立威信。当然孙的名字在人民心中有极大的份量，最后他们即使内心不同意，也只好表面接受了领袖的意见。

皇室提出的议和条款又是使年轻的革命者伤脑筋的事。皇室的要求包括：故宫仍归皇室使用，保留宫廷卫队，提供皇帝个人使用的巨额生活费，皇帝有权接见要求谒见的人。我们多数人认为满清无权为将来要求任何东西。我们反对继续保留任何残余的旧方式。但是孙逸仙又相信袁世凯，说首要的是保证立即退位。因此条款在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埋怨的情况下签订了。孙一向认为他做的事都是对中国最有利的。当然，这是他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错误。选任何别的人都可能好一些，但袁世凯是完全信任不得的。

孙的忠实的朋友们开始黯然离去。他被奸猾狡诈的袁世凯及其支持者所包围，那些老保守派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他

把新生的共和国交给袁世凯。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满清皇帝退位。三天后孙逸仙辞去总统职务。电报从四面八方打来要求他至少干完这一任，但他坚持他的决定，以便不再打仗而使满清下台。

他回到广州，我和他同行。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见到宋蔼龄，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的大姐。

孙博士被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他接受了，但经费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用完了，工作随即中断。

孙博士要在我留在中国，我说我在此不能做什么有实际意义的好事，我要回夏威夷。这是一次悲伤的也是最后的离别，此后我再没有见到他。

十、第一个政府的危机——背叛

尽管孙博士信任袁世凯，但他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把他的心腹黄将军放在南京，监视新总统。袁世凯老奸巨滑，他背着黄将军，扩充并武装了他的部队。

袁世凯当总统时已五十多岁，他颇具军人风度，但本性难移，仍然酗酒、赌博、还抽上了鸦片烟。当了一年总统，他花掉四百万元，多数用于个人挥霍和收买特务、军队及其他随从人员以保护他个人的安全。他感到在北方较安全，拒绝去首都南京，而在北京行使职权。以后几年各类革命者想

刺杀他或毒死他都没有成功。因为他用高薪雇用的特工人员很厉害。有一次他乘坐的轿子遭到袭击，但只打死一个轿夫。他又一次走运。

一九一三年南京议会选举袁任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黎是统治两个省的官员。他们俩一搭一挡，黎比袁软弱也不象袁那么阴险。但在肆无忌惮残酷镇压反对派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有一件事孙逸仙没有估计到，即他的辞职会影响曾经答应给他的贷款。多数贷款取消了，新成立的共和国无力从事正常发展。此时，资金是至关重要的，清王朝比其他国家落后很多，巨大的工作如开辟财源、振兴国家、发展工业等必须立即开始。

袁总统很快证明他确实是臭名昭著。未经国会同意，他就和欧洲签定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贷款条约。他开始推行从清朝老师那儿学来的专制和铁腕统治。他是个背信弃义，残暴凶狠，寡廉鲜耻的人。

一九一三年五月初，孙博士得知袁阴谋害他。孙发现袁用外国贷款来武装他自己的军队，就写信给各国要求停止向袁提供贷款。袁大怒，派军队包围了孙正在访问的李博士的家，要求交出孙，并在北京受审和杀头。孙博士对袁此举大为吃惊，从李博士家的后门逃走。到家时，人们告诉他，他的住宅也有人监视。

孙博士微行出走，试图在三星期内找到他的忠诚的黄兴将军。他从香港到广州，终于来到黄将军的总部，他要求黄帮助把他的家人送到日本去。这两位朋友同意暂时分手，并相约在日本会面。他们打扮成船民，以便出入沿海地区。孙从澳

门乘渔船，十二天后抵达日本门司。得知黄将军已于五天前到达长崎，成功地完成了孙博士交给他的任务。

孙博士又一次过上流亡生活，他给袁世凯写信，尖锐地谴责袁背叛国家和人民，说明自己将象反对清朝王一样反对袁。他终于认清了袁巧言令色假面具后面的狰狞面目。

孙博士的朋友和追随者再次劝他，为了他自己，应采取阻力最小的迎合现政府政策的路线，但孙还是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决心要为人民争取公正的待遇。

大多数追随者，包括宋氏家族的人和他在日本会合。他已请刚从美国大学毕业回来的庆龄一蔼龄的妹妹，当他的秘书，那时蔼龄已成了孔夫人。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排除了国会的反对，得到五年任期。一九一四年，他把任期又增加到十年，并规定由他自己选定接班人。这些当然仅仅是他称帝的前奏，称帝才是他最初和最终的目的。他利用不正当的贿赂、威胁等手段，“接受”人民要求君主立宪的请愿。一九一六年，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宣告自己为皇帝。

袁世凯走得太远了。他的贷款用完了，他掠夺了中国大地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盐税等等。他知道如果不现钱喂饱他的追随者，就无法保证他们忠于他。我想他开始感到恐慌了。有一天晚上，他用自己的剑杀了他的爱妾和她的新生婴儿，只有绝望的恐慌和疯子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做了很短时期的皇帝，他被迫重新恢复共和，三个月后他就死了。他的死，无疑部分是由于他的失败。我想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自私的人。

十一、试图重整旗鼓——部分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正在为称帝作准备的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了这个条约。

孙博士命令他在广东、湖南及其他据点的部下讨伐袁世凯。龙济光将军为袁卖力，杀死了约一万名反袁者，但讨袁运动继续发展。孙博士命令其他将领去各地发动讨袁，派李烈钧去云南，黄兴将军去湖南，南方各省都参加了。

黎元洪接替袁世凯担任总统，形式上保持了共和。但孙博士认识到他必须从头作起，来解放他的人民。必须使用武力，他不再发表徒劳无益的言论，他勤勉慎重地从事他的新的革命。从他忠实的海外追随者那里又筹募到了钱，他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

一九一七年他终于有力量回到中国组织军政府了。五月，北方的将领发动叛乱，张勋迫使黎元洪解散国会，把废弃的溥仪再度捧上皇位。似乎中国注定又要恢复老样子了。

一九一七年南方各省革命成功，孙博士再次回到广州，领导当地政府。八月，前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改组国会，决定成立临时军政府讨伐北洋军阀，孙逸仙被选为海军大元帅。在此之前孙曾向他们建议在南方另组织新政府。到时候

取代北方的政府。作为这个新政府的头头，孙一度成为绝对专权者。

他终于认识到，把中国各种新、旧力量结合起来，达到一定程度的长治久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他一贯崇尚和平，反对暴力，现在要他放弃说理，拿起武器，使他感到很为难。但这是统一中国所必需的。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段丢掉幻想，接受考验的时日。但孙逸仙决心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共和国而奋斗，毫不气馁。他继续运用他的军事权威，派遣军队北伐。

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哪些人是不可信赖的。尤其是象袁世凯那样的军阀，一直在挑拨南北双方互相斗争，以便扩张自己的地盘。孙认为不能依靠他们，但又不得不利用他们。如同过去一样，孙的追随者中仍有一些人主张因袭旧制，对彻底改革政府观望不前，而年轻人中有些人不愿再等待了，对任何延误都感到愤愤不平。孙逸仙是居间调节人，也是他们的主要依靠。一个优柔寡断或鲁莽从事的人往往会被公众舆论所左右，或完全丧失判断力，但孙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等待，什么时候应该行动，他的镇定自如是无与伦比的。

北京政府又发生了变化，溥仪被赶下台，但同保皇派妥协又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选举冯国璋当总统。他立即被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为同盟。

孙逸仙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对此举，他表示中国是个新生的共和国，自己还顾不过来，怎能帮助别国，内战还打不过来，怎能对付世界大战。

南北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继续不断，但未见成效。一九一八年孙博士放弃广州，前往上海，开始写《实业计划》，提

出中国急需其他国家的帮助。他认为只有利用外国的援助，中国才能得救。他指出在帮助中国发展的同时，各国自己也能得到好处。这是一个指导中国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纲领。

孙再次发现有钱的华侨是他的主要支持者，很多人倾囊相助。孙博士继续以笔代剑，写了很多文章，在建设杂志上广为传播，还向人民宣传“知难行易”的学说。阐明去做一件事是容易的，而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应该做的事就困难了。

除了写作，孙博士还忙于为收复广州而策划的军事行动。他获得来自海外的资金的帮助。他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住房也是华侨赠送的，孙甚至把他的住房抵押出去，而押金也是华侨支付的，以便有急需时再次抵押。孙博士一生从不考虑自己和家庭，完全献身于他的事业。

一九二〇年他去长崎考察日本的先进造船业。他和他的追随者在长崎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是否能对开发中国的资源和交通事业有所作为。讨论结果，一致认为首先必须实现和平统一。

经与陈将军（指陈炯明一译注）策划，广州再次得到解放，孙博士被邀请回广州。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广州国会选举孙博士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日为他举行就职典礼。这是一次个人的胜利，也是前进了一步。但包围他的仍然是阴谋和猜忌，陈将军和另外一些人并非真心支持他。

尽管如此，孙仍立即策划经过广西进行北伐。

部分出于为自己的革命考虑，苏联对孙的工作很感兴趣

趣。他们派代表从广东去广西会见他。许多外国人感到中国几乎不可能实现和平，倒不如南北分治，还可能都得到外国承认。孙博士不听这套，他主张中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完成统一大业。

当北方的吴佩孚将军建议和谈时，孙表示同意。但，象往常一样，计划尚未实现就被北方撕毁了。

那时孙还不了解陈炯明将军心怀异志，命令他北进。陈将军反对说，军队还没有作好准备。总统命令他采取行动，他进军缓慢，作战不力，结果被打败了。当孙责备他不服从指挥时，他反而抱怨总统未提供援军。四月，孙派人去广西解除陈的职务，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却率领他的部队回到广州包围了总统府，用枪炮猛烈轰击。孙和他的夫人死里逃生，到一艘军舰上会面后去上海。

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孙在上海为和平解决南北争端进行谈判，因为北京政府又一次请他出面帮助解决问题。但情况很明显，双方都不知如何了结这连年的战争。孙博士尽一切努力，使原国会议员回到北京开会，但他们失望地发现北方仍旧坚持他们的观念和偏见。由于一事无成，只好放弃一切。最初看来似乎成功有望，因为陈炯明背叛孙以后，直、奉两派地方军阀打起来了，直系打胜，把冯国璋总统赶下台，请黎元洪当总统并重新召开国会。

人们都认为因为内战，中国毫无指望成为世界强国，只有它的忠贞战士孙逸仙不这样想。如同一个有耐心的父亲对待一个顽皮的孩子，他再一次准备拉着中国的手把它引向光明。

十二、 苏联的影响

由于屡遭失败，资金短缺，支援减少，必须向一切可能的方面寻求援助。一九二三年一月，孙博士遇见了一位同情他的苏联代表阿道夫·罗费。这个俄国人并非空手而来，他向孙博士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悔恨过去拒绝国外朋友的善意忠告，孙现在急切地希望接受能得到的任何帮助。这样开始了苏联对南部中国的巨大的影响。

一九二三年二月，部队一致选举孙博士当领袖，他恢复了在广州的权力。香港的态度也变得更合作友好了。

孙回到广州，发现整个南方一片混乱，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资金。部队领不到饷，开始骚动，去农村到处抢劫，制造灾难。当孙博士正要处理这种新的混乱时，另一个俄国人米歇尔·鲍罗廷由苏联来，任南方的顾问。最初，他的工资由莫斯科支付，后来由中国南方政府负担。孙对鲍罗廷十分信任，鲍成为南方的实际上的总理，这个共和国现已深知来自国外的援助和忠告对它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内部斗争如此严重，孙逸仙仍然敢于梦想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得到全世界承认，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他也看到前途艰难，有可能失败，何况他身体日趋衰弱，就更使困难倍增了。如果他采取最容易的办法一投降，也是不足为

奇的，但孙博士生来不会放弃他的理想。他从不宽容自己，革命再革命，失败再失败，个人的苦难、受辱、挨批评他都能忍受，但要他放弃建立一个自由中国的希望和梦想是不可能的。

他最后统治广州的那些日子是最艰难的。军队在农村造成恐怖世界，肆意烧杀掠夺，土匪和城市商人之间的火并几乎无宁日。孙感到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这种混乱局面的，只有苏联真正帮助他，因此，他越来越转向苏联方面。

一九二三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孙说：“我们不再指望西方国家。我们面向苏联。”但他只是在得不到别的帮助时才接受苏联的援助。苏联确实给了他物质援助。在鲍罗廷的帮助下，他建立了黄埔军校，苏联军官用最先进的方法训练年轻的中国学员。他命令进行一次北伐，成功地解除了曹锟的总统职务，派段祺瑞当临时执政。段要求孙去北京开会，商讨就如何实现持久和巩固的和平达成协议。

十三、疾病、逝世、留给人民的遗嘱

孙同意去北京出席和平会议，除了中国代表，他还安排一些外国代表参加会议。

他身体很不好，离开广州就患出血症，但为了给他为之长期奋斗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他不顾个人的病痛，亲自安

排每一细节并长途跋涉去日本、上海、天津等地发表长篇讲话，号召人们团结起来。

在天津，他得了肝病，抵达北京时，他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去治疗。化验证实他得了肝癌，是不治之症。他被送到他的朋友顾维均的家中，他住在那里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去世。他死时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宋庆龄、儿子孙科和他的女儿。他坚持把手放在被子外面，象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

他的葬礼是基督教方式的，因为他的妻子知道他会这样要求的。

四月五日是丧葬日，遗体被隆重地移到协和医院礼堂，灵前安放着孙逸仙的巨幅照片和花圈。

巨幅照片随后被放在灵车前，万众群集，来向他们已故的领袖致敬。

孙博士要求葬礼从俭，不要搞纪念活动。他没想到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人们立即为他集资建立巨大的陵墓。临时安息处在颐和园附近的碧云寺。全世界的中国人在各地举行追悼仪式，悼念他们的伟大领袖，中华民国真正的国父。

他去了，但他给人民留下了丰富的教导。他告诉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中国只有实现持久的巩固和团结才能达到自由、平等的目的。他指出共和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他要求人们根据他发表的著作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继续奋斗，直至完全达到目的。

他要求立即举行他生前来北京准备参加的人民代表大会，

对他的家人他留下他的祝福并希望他们继承他的事业。他把房子、书籍和衣服留给他的妻子宋庆龄并说他的儿子和女儿已经成年，可以自立。除了一些个人生活用品，他没有什么遗产，因为他从来没有为个人或家庭去获取什么。

国民党建都南京后，选了一块地作为孙逸仙的陵园，修建资金是从他的追随者募集来的。陵园建筑是中国式的，陵前设有灵堂。陵园位于紫金山麓，四周都是孙喜欢的树木，有很长的台阶通向陵墓。

这个巨大的纪念陵离明陵不远。象征着一个农村孩子终于征服了中国的压迫者。这个伟大的领袖死后比生前更加深得民心，在他的遗体落葬时举国致哀，给他殊荣。

一九二九年用花岗石和大理石修建的陵园完工。六月，中华民国的国父最后被安葬在南京城外紫金山麓。他的家人孙夫人、孙科（那时是铁道部长，从事他父亲梦寐以求的发展中国交通事业）近亲好友以及孙逸仙的长期追随者等许多人参加了葬礼。

从国民党总部出发，送葬队伍在两侧都是人群的新建道路上缓缓前进，直至陵园。正午十二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在静静地悼念他们的领袖。

他去世后的四年中，孙逸仙的英名在全世界到处传扬。他已经成为了圣者和传奇人物，他的名字是中国自由的象征。

在临终前，他还叮嘱要“和平奋斗救中国”。人们把这句话作为战斗口号，学校规定每天要举行仪式向国父致敬。

孙临终时可能还念念不忘他的理想尚未实现，但他的学说中对中国的希望和对中国人民的信任就象他家乡翠亨村的金槟榔泉水那样，永放光芒，常葆青春。

现在，毫无疑问，孙逸仙这位勇敢无私的理想主义者，在国内外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解放者的先驱。

的确，一个伟人需要的是事业而不是纪念碑，但孙逸仙除了南京雄伟的陵园外，还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心中建立起他的圣殿。人们推崇他为中华民国的先驱和奠基者。

封面设计：张灵芝

统一书号：10481·022
定 价： 0.70 元